



气候行动与性别平等协同 中国数据报告

Data Analysis Report
Synergy of Climate Ac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关于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

CLIMATE FUTURE GLOBAL INNOVATION LAB C FORCE LAB

今天，人类生活的地球被地缘战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内在焦虑等挑战包围，全球范围内一场关于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反思正在酝酿。推动绿色转型，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早日实现碳中和，完成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成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延续要作出的选择。

从当下时刻到绿色未来，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

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创造。

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的构想由此而生。

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是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孵化的探索型合作平台，通过与全球伙伴开展多元创新合作，探索全球生态文明转型的新势能、新方向、新行动和新故事，在内在与外在、当下与未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搭建思想与行动的联合空间站，共同探索通往人类未来的新航道。

新势能：汇集国际、国内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前沿领域科学家与行动者，通过组织跨界对话，共同探讨文明转型的新可能。实验孵化的项目如“大气候对话”，已经先后邀请耶鲁大学国际领导力中心创始主任艾玛·思盖，耶鲁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全球生态文明领军学者玛丽·伊夫琳·塔克参与，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limate Watch达成战略合作。

新方向：结合国际和国内热点趋势开展追踪分析，将国际热点议程引入国内，将国内特色案例带到国际舞台，通过开展联合实验、试点推广和国际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实验孵化的项目如全球食物系统转型伙伴关系孵化器（哈佛-北大联合研发）、气候与自然全球合作网络、中国成都铁牛村生态文明综合试点等。

新行动：青少年是碳中和未来的主人，从保护和激发青少年好奇心、勇气和同理心的角度研发系列活动和平台，开发国际合作计划，创新培育全球碳中和领军者。正在实验孵化的项目如云起公益、地球行者倡议、盖亚之舟等，成功案例有北大-巴政气候周、气候未来青年工作坊等。

新故事：面对诸多挑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大脑第一反应是恐惧和逃跑。实验室结合新势能、新方向和新行动的探索进度，即时研发正向乐观的新叙事，为共创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支撑动力。

报告出品：
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
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
C Force Lab

更多信息请联系 cforce@pku.edu.cn

报告主编：王彬彬
报告数据科学家：卢丹柠、邢景丽、艾斌
报告校对：霍莉
报告设计：李婧婷

Copyright © C Force Lab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未来，并不遥远，而在每时每刻。
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期待与您共创绿色未来！

关于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

INSTITUTE OF CARBON NEUTRALITY
PEKING UNIVERSITY

前言

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成立于2023年3月，是北京大学批准成立的独立类二级实体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面向2030年重点布局建设的四大交叉平台之一，现有来自20多个学院的110多位双聘教师，也是北京大学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战略重点。碳中和研究院由北京大学副校长朴世龙院士担任院长，依托北京大学的文理农工医多学科交叉优势和对外交流广泛的国际化优势，紧密围绕国家“双碳”战略需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战略性、综合性和前沿性研究为重点，坚持守正创新，强化有组织的科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系统性创新成果，助推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为国家“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北大智慧和北大力量。

更多信息请登录碳院官网：<https://carbon.pku.edu.cn>

2025年是《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也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三十周年。《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限制全球平均气温升幅，同时促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189个国家一致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不管是《巴黎协定》还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国在推动其达成的过程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5年，距离2030年前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五年时间。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评估，目前来看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无一走上正轨，只有17%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望在2030年之前实现。整体看来性别平等、气候行动、和平、正义等领域存在严重不足。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提出三十周年的历史窗口期，本报告基于全国范围的气候行动认知调查数据，从性别维度切入，与年龄、城乡、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五个维度进行交叉，开展细分研究，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出对利益相关方有益的建议，供各方参考。

关于数据

本报告使用王彬彬博士课题组2022年在中国大陆开展的全国性代表性调查（不含港澳台地区），总样本4179份。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进行。考虑到中国大陆16.42亿手机用户的人口基数与116%的手机普及率，采用手机样本在技术层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使用按人口比例概率抽样法，将全国人口划分为350个抽样单元，包括四个直辖市、333个地级行政单位（如293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以及省辖范围内的县级市或县。每个单元的样本数量根据当地人口规模分配。为确保样本的多维度代表性，课题组根据几个核心社会人口特征设定了多个配额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城乡分布、收入、教育水平与职业类型。在抽样完成后，还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使其在上述社会人口变量上更贴近全国人口特征分布。最终样本覆盖15岁至74岁的各类人群，在99%置信水平下的抽样误差为±2个百分点。

2012年起，王彬彬博士牵头课题组在国家出台五年发展规划的第二年用国际通用的方法设计问卷和科学样本，按照对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应对、政策、行动的认知及气候传播渠道与内容的效果评价等六大类问题设计问卷，组织全国范围的公众气候认知调查，以评估公众的气候认知状况，特别是对五年发展规划相关的气候政策的反应，以期帮助政策制定者结合民意完善政策的修订和落实。相关调研发现以政策建议的形式提交有关部委，数据被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年度白皮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引用。

目录

01	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度	06
	一、女性整体听说过气候变化比例更低	07
	二、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发生的认知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09
	三、女性对气候变化的成因认知度低	10
	四、女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普遍高于男性	13
	五、女性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重要比例更高	13
	小结	15
02	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度	16
	一、女性更低比例称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	17
	二、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认知比例更高，对动植物影响认知男女差异显著	19
	小结	22
03	中国女性对双碳目标的认知度	23
	一、“是否听说过中国的双碳目标”现状	24
	二、对中国的双碳目标支持现状分析	24
	三、受访者对“中国的双碳目标可否实现”的认知现状	26
	四、受访者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态度的认知现状	27
	五、受访者对可再生能源使用态度的认知现状	28
	小结	31
04	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执行度	32
	一、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支付意愿上男女有显著差异	33
	二、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支付意愿上男女有显著差异	35
	三、男女受访者在环保生活方式行为上差异	38
	四、男女受访者在公众领域气候友好行动上的差异	42
	五、男女受访者对低碳生活的阻碍认知差异	45
	小结	48
05	中国女性对气候传播渠道与内容的效果评价	49
	一、女性在生活中听说气候变化频率更低	50
	二、气候变化信息接受途径男女差异	50
	三、男女关注新闻类型差异显著	51
	四、男女受访者均愿意更多了解气候变化相关信息	52
	五、女性对各个信息源信任度更高，男女回答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53
	小结	53
06	中国女性气候认知与行动潜力分析	54

01

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度

在本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围绕“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是否认为气候变化在发生，气候变化成因，对气候变化的担心程度，气候变化对个人的重要程度”五个问题，对比城乡、不同教育水平、年龄段、职业、收入水平的女性与男性的认知水平。

一、女性整体听说过气候变化比例更低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性别在“是否听说过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的回答存在显著性差异。

■ 如图1-1所示，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女性（34.2%）表示自己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29.8%的女性表示自己“了解一些”气候变化，仅4.4%说自己“了解很多”。约一半的女性称自己对气候变化“只了解一点”（55.5%），还有十分之一女性称从没听说过气候变化（10.3%）。男性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的比例比女性高近10个百分点（44.1%）：34.8%的男性表示自己“了解一些”气候变化；9.6%说自己“了解很多”，是女性的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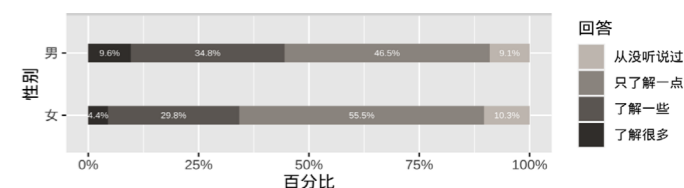


图1-1 是否听说过气候变化

■ 从城乡维度进一步看，城市女性的气候变化认知高于农村女性。图1-2显示城市女性中有约四成（38.2%）表示自己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回答“了解一些”与“了解很多”受访者的加总，下同），高于农村女性的比例；而农村女性中仅有约四分之一（27.9%）表示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为所有组别中最低。农村男性的认知比例（37.9%）与城市女性较为接近，明显高于农村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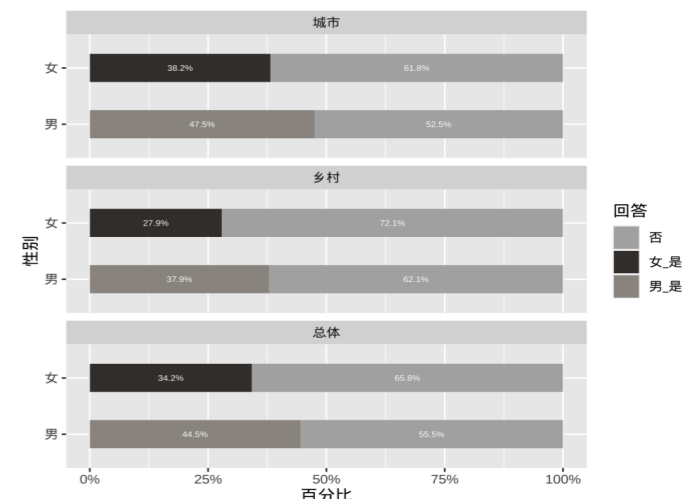


图1-2 城乡受访者“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的对比

■ 不同教育水平的男女在气候变化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如图1-3所示，整体呈现出随教育程度提高而认知水平上升的趋势，所有教育水平中女性低于男性。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男女受访者认知水平均高于总体水平，其中女性中有约四成（42.1%）表示对气候变化“了解一些”或“了解很多”，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学历层级的男性，但仍低于同学历的男性（52.1%）。相比之下，初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的认知水平较低，仅有约二成（22.0%）表示了解一些或了解很多，高中学历女性中该比例为约四分之一（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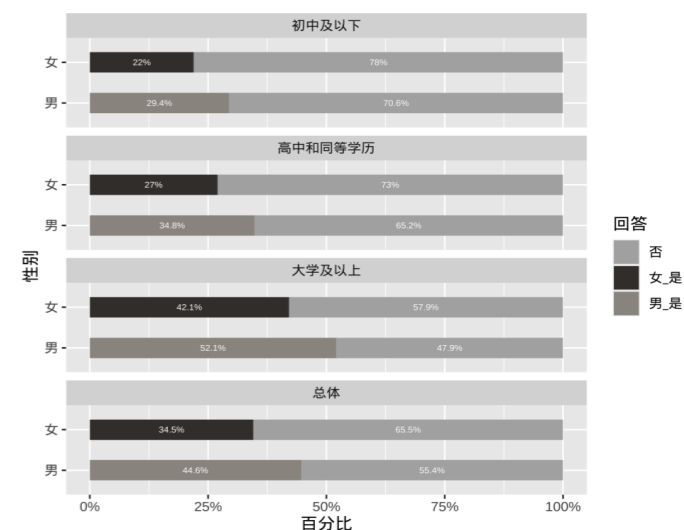


图1-3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的对比

不同年龄段男女在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如图1-4所示，中年女性和男性的认知度最高，且在各年龄段中男性的认知水平均高于女性。中年女性中约有四成（41.7%）表示对气候变化“了解一些”或“了解很多”，而同一年龄段中男性的比例为46.5%。青年女性中约三分之一（32.9%）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接近于青年男性的认知水平（38.0%）。老年女性中，仅有五人中约一人表示了解气候变化（20.1%），为所有组别中最低，且与该年龄段男性（44.1%）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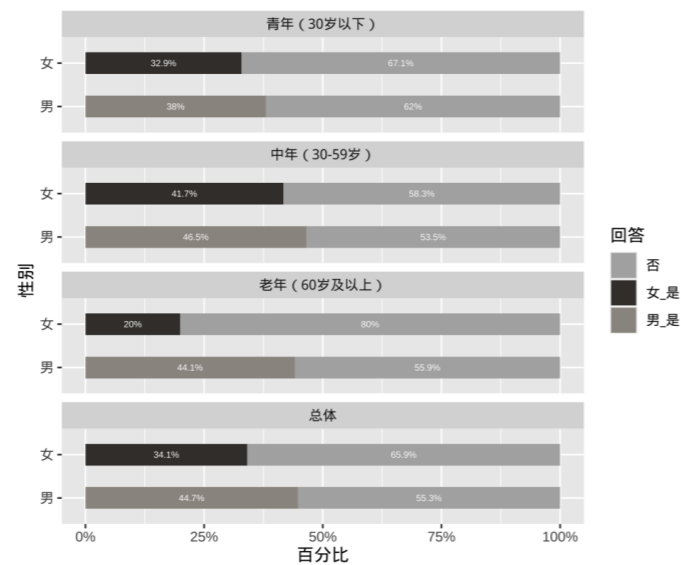


图1-4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的对比

在不同收入水平中，女性在各组别中表示对气候变化“了解一些”或“了解很多”的比例均低于男性。如图1-5所示，女性群体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随着收入的提升而上升。较高收入的女性中，超过四成（43.4%）表示至少有一些了解，略高于中等收入女性（42.4%），也明显高于较低收入女性（31.7%），后者仅约三分之一具备基本认知。男性群体中，中等收入男性的认知水平最高，超过一半（50.8%）表示对气候变化有一定了解，这一比例不仅高于较高收入男性（48.9%），也远高于较低收入男性（39.3%）。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男女之间的认知差距最大，约8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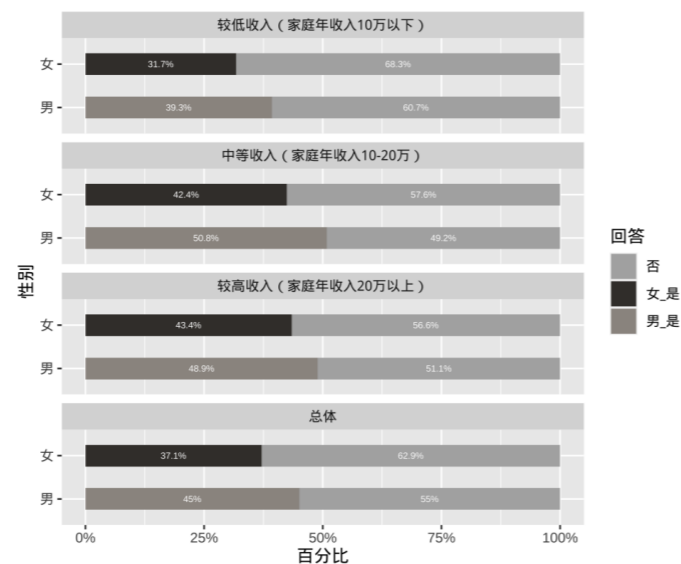


图1-5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的对比

不同职业类别中的男性与女性在气候变化认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各职业群体中的认知水平普遍略低。如图1-6所示，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气候变化认知度最高。其中，近一半女性（44.9%）表示对气候变化“了解一些”或“了解很多”，而该职业群体中的男性认知水平最高，达到六成（60.7%）。商业从业者的认知度次之，女性近四成（39.3%），男性为44.3%，两者差距相对较小。学生群体中，女性和男性分别有37.1%与39.8%表示至少对气候变化有一些了解，是所有职业类别中性别差距最小的一组。

相比之下，自由职业者、农民和退休人员中的女性认知水平较低。女性自由职业者中，仅28.7%表示对气候变化有一定了解，与该职业男性差别显著(40.7%)。女性农民和退休人员的认知最低，比例在四分之一左右，分别为25.2%和25.0%。在自由职业和退休群体中，男性和女性的认知差距尤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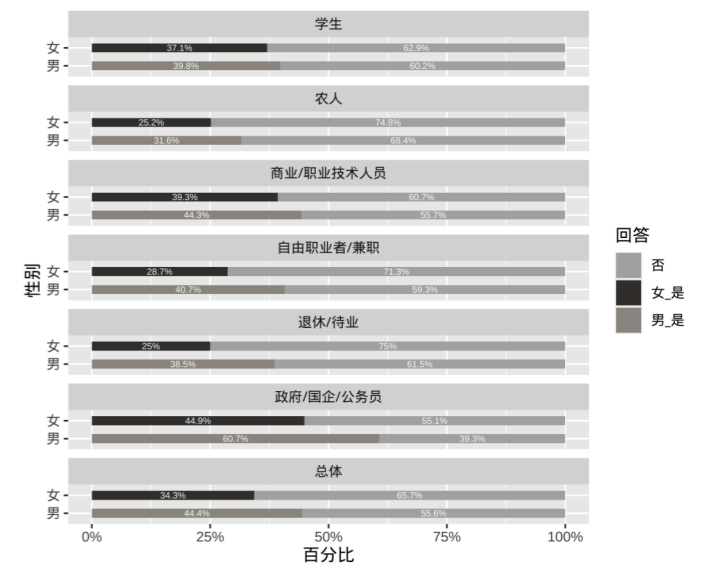


图1-6 不同职业受访者“对气候变化至少有一些了解”的对比

二、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发生的认知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发生这一问题上的回答无显著性差异(p值 = 0.33)。如图1-7所示，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在发生的整体认知都非常高，超过九成，女性总体（97.6%）略高于男性（97%）。在部分女性群体中对气候变化发生的认可度几乎接近100%，如较高收入水平、大学学历及以上、政府/国企/公务员群体等。

这一结果在国际比较中亦显得尤为突出。例如，2022年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针对美国公众的调查显示，仅有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这一对比说明，中国公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识程度显著高于部分发达国家，至少在气候变化是否真实存在这一基础认知层面，表现出更强的认同和统一性。这为气候行动的动员打下坚实基础，但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成因、机制或应对责任的深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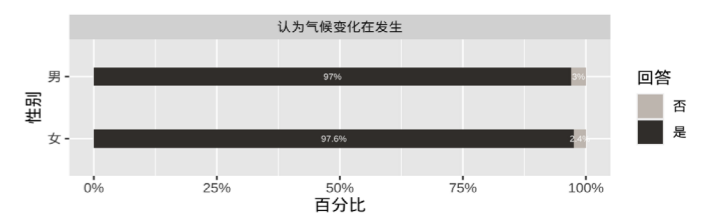


图1-7 男女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在发生”的认知对比

三、女性对气候变化的成因认知度低

在气候变化成因的认知上，女性对科学主流观点的理解仍显不足。尽管已有大量科学研究明确指出人类活动，特别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是当前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仅有一半多女性（56.3%）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男性有63.4%认同，根据卡方检测显著高于女性。如图1-8所示，近五分之一的女性受访者（19%）认为“主要由环境自发变化引起”，23.4%认为“两者都有”。这说明虽然女性在气候变化是否发生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在气候变化成因的认知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在人类责任这一核心议题上，中国女性尚未全面掌握当前科学界的基本结论。加强对气候变化成因的科普教育，特别是对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因果关系的传播，将是推动公众深入理解气候问题、提升行动意愿的关键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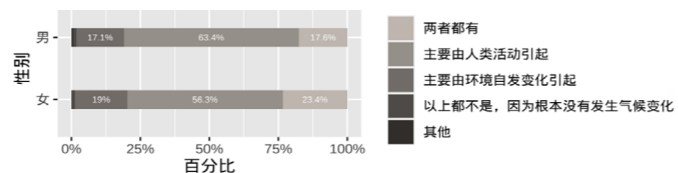


图1-8 男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成因的认知对比

如图1-9所示，城市女性（60.7%）和城市男性（66.3%）对气候变化人为成因的认知度均高于农村的女性（49.1%）和男性（56.7%），差距在十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和农村中男性认知度均高于女性。农村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人为成因认知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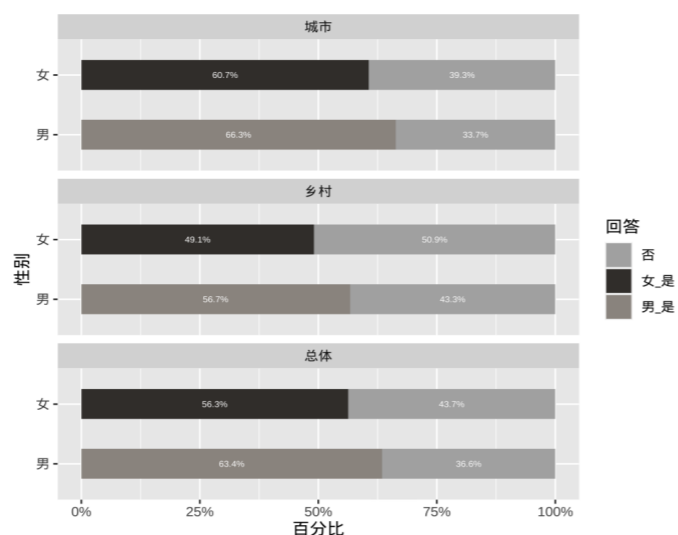


图1-9 城乡受访者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认知对比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是否在发生这一问题上的回答无显著性差异(p值 = 0.33)。如图1-7所示，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在发生的整体认知都非常高，超过九成，女性总体（97.6%）略高于男性（97%）。在部分女性群体中对气候变化发生的认可度几乎接近100%，如较高收入水平、大学学历及以上、政府/国企/公务员群体等。

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人为成因认知随学历升高而升高。如图1-11所示，初中及以下女性认知度为47.43%，高中及同等学历女性提升至52.12%，大学及以上学历女性则达到61.15%。高中及同等学历，男性（63.85%）与女性（52.12%）的差距最大，近12个百分点。初中及以下学历男女认知差较小，男性认知度（54.77%）较女性（47.43%）高出约7个百分点。大学及以上学历中，男女认知度最接近，分别为64.95%和61.15%，差距缩小至约3个百分点，反映出教育对女性科学认知能力的积极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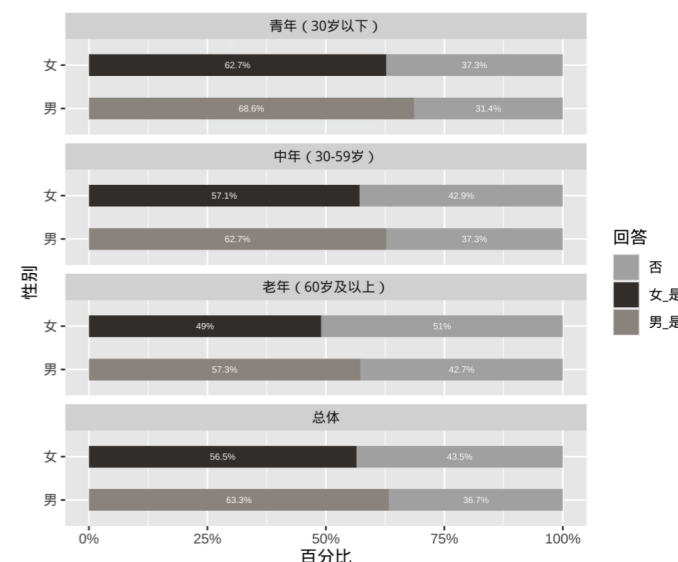


图1-10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认知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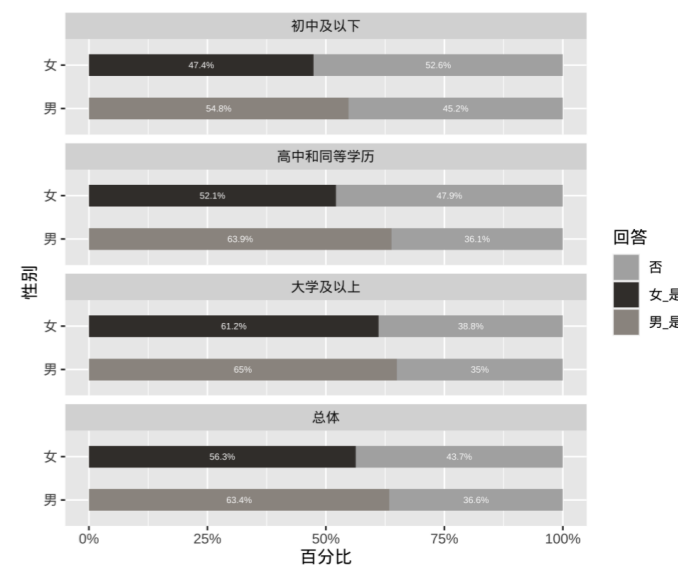


图1-11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认知对比

■ 如图1-12所示，较高收入群体整体对气候变化人为成因的认知最高，男女受访者中认知度都随收入增长变高，女性中各收入群体差别更明显（较低收入女性认知度49.8%，中等收入55.9%，较高收入68%）。各收入阶段男性认知度略高，较高收入群体中男性(69.4%)和女性(68%)认知度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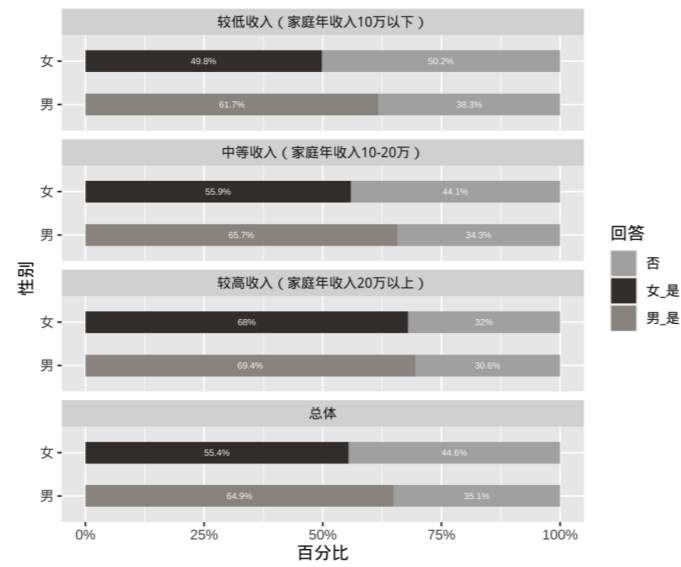


图1-12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认知对比

■ 如图1-13所示，在不同职业群体中，女性和男性学生对气候变化人为成因的认知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66.8%和76.4%，超过三分之二。政府/国企/公务员男性和女性认知比例其次，分别为59.6%和65.3%，六成左右。女性自由职业者(57%)和商业/职业技术人员(56.7%)认知也较高，而女性农民(47%)和退休(51.7%)群体对气候变化成因认知有待提高，尤其女性农民在所有组别中认知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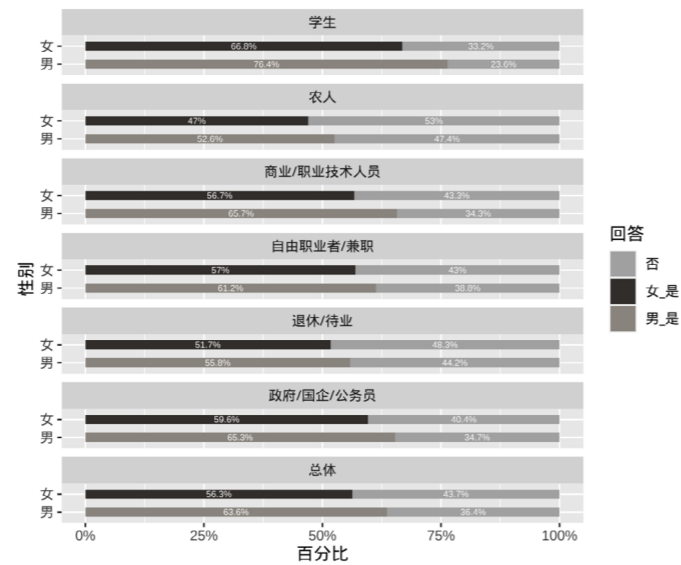


图1-13 不同职业受访者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认知对比

四、女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普遍高于男性

■ 整体来看，女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普遍高于男性。如图1-14所示，女性中有近五分之一（19.4%）表示“非常担心”气候变化，略高于男性（18.4%）。近三分之二女性（63.3%）表示“有些担心”气候变化，高于男性（55.7%）。相对而言，男性中“不太担心”及“完全不担心”的比例较女性更高，分别为18%和7.9%，女性对应比例则为13.6%和3.7%。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男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有所上升，而女性则呈现出相反趋势。女性所有收入水平上更担心气候变化，较高收入女性最高，较低收入女性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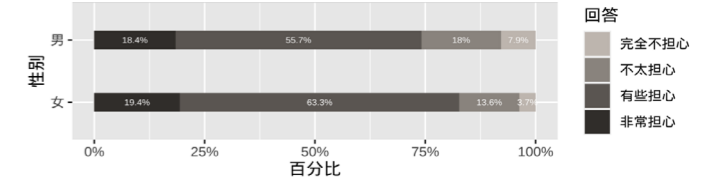


图1-14 男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担心程度对比

五、女性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重要比例更高

■ 女性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主观认知略高于男性，更高比例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根据卡方检验，男女在该项认知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如图1-15所示，在女性群体中，超过四成（41.1%）认为气候变化“非常重要”，与男性（41%）几乎持平；另有36.17%的女性认为“比较重要”，明显高于男性的29.9%。相比之下，男性在“比较不重要”和“一般重要”上的比例更高，分别为5.9%和23.2%，而女性对应比例为2.6%和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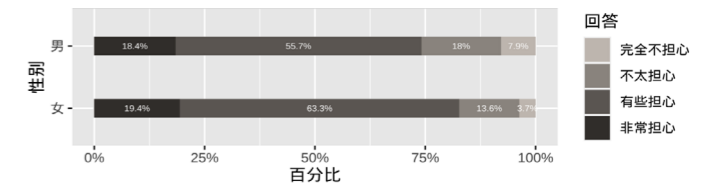


图1-15 男女受访者回答气候变化对个人重要性的对比

■ 如图1-16所示，农村女性(96.5%)和城市女性(96.1%)均更认同气候变化对自己“一般重要”、“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城乡女性的认同比例几乎一致，略高于农村男性(91.6%)和城市男性(92.9%)。农村女性虽然对气候变化的成因认知较低，但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主观认知是所有组别中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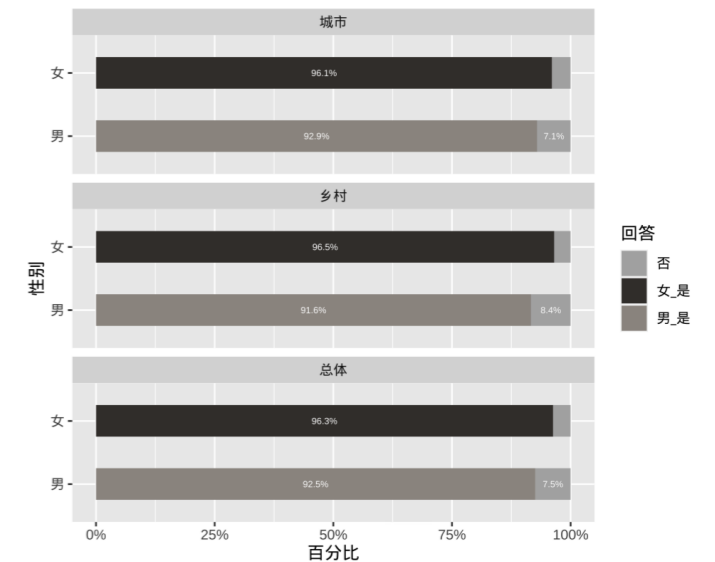


图1-16 城乡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重要的对比

■ 如图1-17所示，对气候变化重要的认知在高中学历群体中最高，男性（93.2%）和女性（97.3%）都是。大学学历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重要性认知其次，分别为92.5%和96.4%。初中及以下男性和女性最低，分别为91.4%和94.7%。各组别之间差异不大，女性在各教育水平上认知略高但男女之间差异不大，均在九成以上，表明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重要性认识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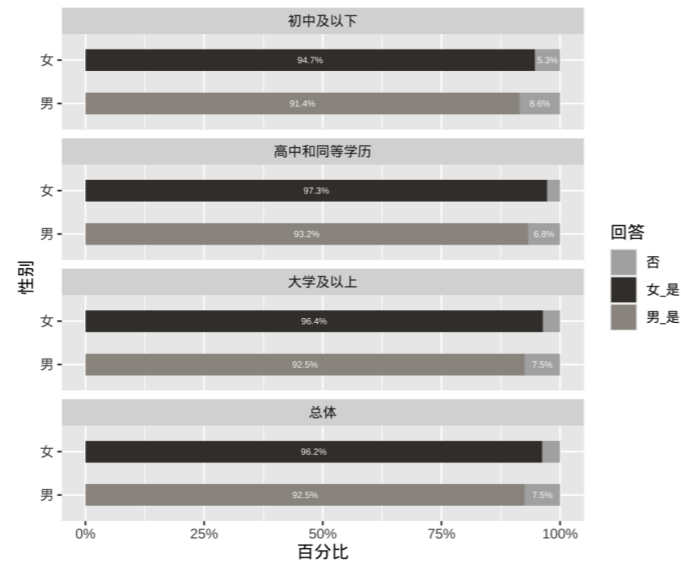


图1-17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重要的对比

■ 如图1-18所示，各年龄段女性对与气候变化对自己重要性的认知均在96%，青年女性最高（96.5%），每个年龄段女性认知度均高于同年龄段的男性。男性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知随年龄段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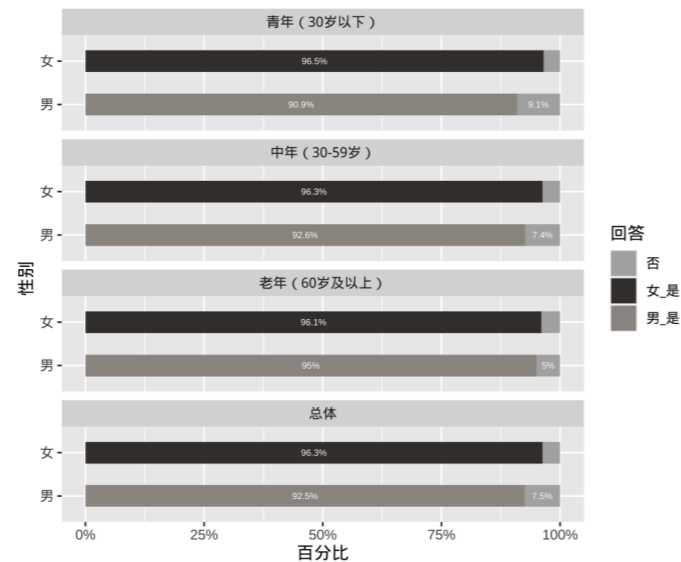


图1-18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重要的对比

■ 从不同收入水平上看，如1-19显示中等收入女性对气候变化重要性认同度在所有组别中最高（97.7%），较低收入女性其次（96.3%），较高收入女性最低（93.4%）。男性各收入水平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知度几乎相同，较高收入中男女差异不大（男性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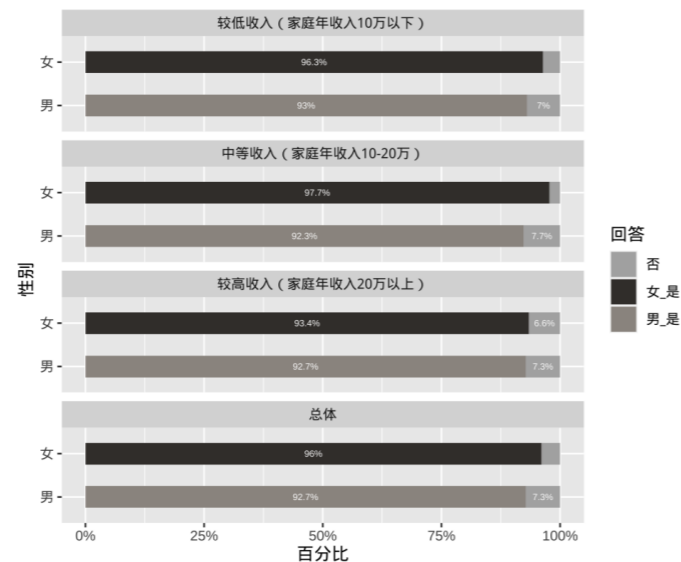


图1-19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重要的对比

■ 各职业女性对气候变化对自己更重要的认知度均略高于男性，农民、退休、自由职业者、商业差距较大。如图1-20所示，女性学生（98.1%）、政府/公务员（96.7%）、自由职业者（96.5%）最担心，但各组别认知度均在95%以上，退休待业女性最低。男性群体中，政府/公务员（95.2%）、农民（93.8%）、自由职业者（93.8%）最担心，尽管男性农民在对气候变化其他维度认知上略低于其他职业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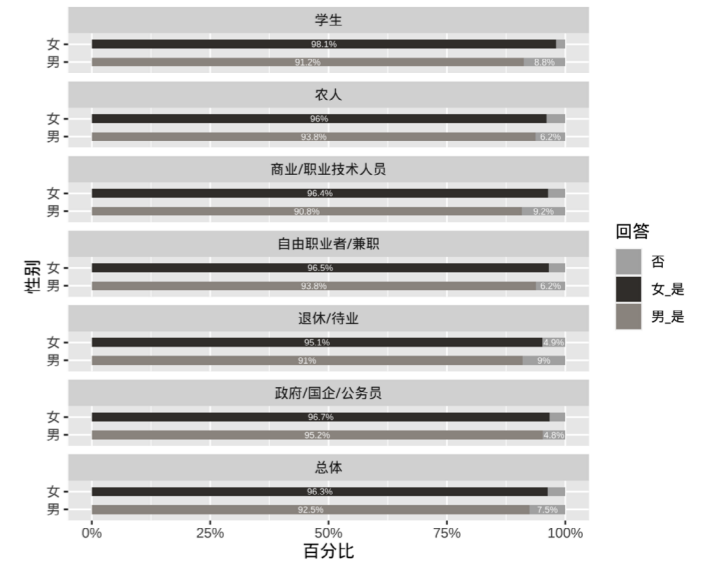


图1-20 不同职业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重要的对比

小结

- 中国公众整体对气候变化在发生认同度超过90%，但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人为成因认识不足，农村女性尤为突出；
- 农村女性和较年长、退休女性群体的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尤需加强；
- 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人为成因认知随学历升高而升高，反映出教育对女性科学认知能力的积极促进作用；
- 较高收入群体整体对气候变化人为成因的认知最高，男女受访者中认知度都随收入增长变高；
- 女性更担忧气候变化；
- 随着年龄增长，男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有所上升，而女性则呈现出相反趋势；
- 女性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的重要程度高于男性；
- 农村女性虽然对气候变化的成因认知较低，但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主观认知是所有组别中最高的；
- 各年龄段女性对与气候变化对自己重要性的认知均在96%，青年女性最高（96.5%）；
- 中等收入女性对气候变化重要性认同度在所有组别中最高（97.7%）；
- 各职业女性对气候变化对自己更重要的认知度均略高于男性。

02

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度

基于“个人是否经历过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和“气候变化对不同健康问题的影响”三个问题，我们在本部分重点分析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在此基础上，针对男女受访者认知有显著差异的议题，进一步对比了城乡、不同教育水平、年龄段、收入水平和职业的男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

一、女性更低比例称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

■ 如图2-1所示，六成女性受访者(60.4%)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比男性低(68.1%)，根据卡方检测男女的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结果反映出女性在主观层面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相对较弱。然而，考虑到数据来源于受访者的主观判断，该差异未必对应于女性在实际、客观层面上经历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低于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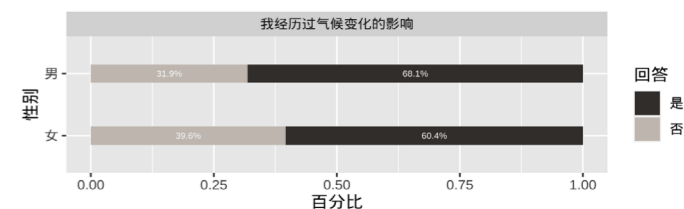


图2-1 男女受访者对“我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回答对比

■ 从居住区域对比来看，如图2-2所示，农村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观感知程度最低（56.9%），低于城市女性（62.6%）。农村男性(68.2%)和城市男性(68.1%)对气候变化影响主观感知程度几乎类似，较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均更高比例说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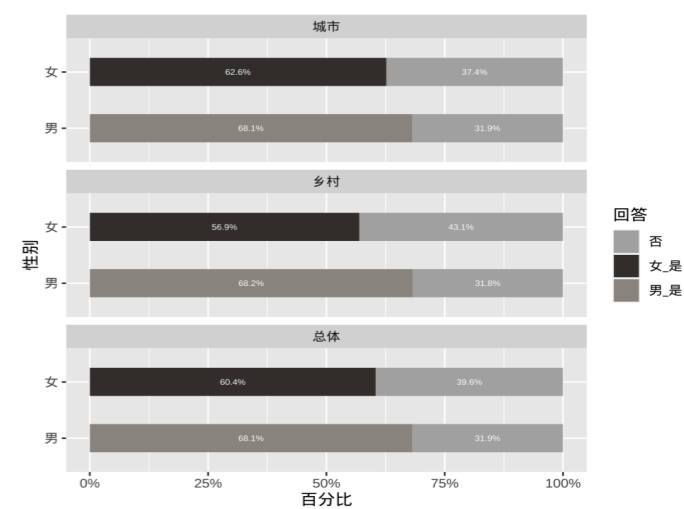


图2-2 城乡受访者对“我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回答对比

■ 从教育水平来看，如图2-3所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观感知整体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变强，男性在各教育水平的主观感知均高于女性：62.9%大学学历以上女性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略高于高中学历女性（61.2%），明显高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女性（53.7%）。男性各学历水平主观感知度更高，七成大学学历以上男性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高于高中学历男性（66.8%）和初中学历及以下男性（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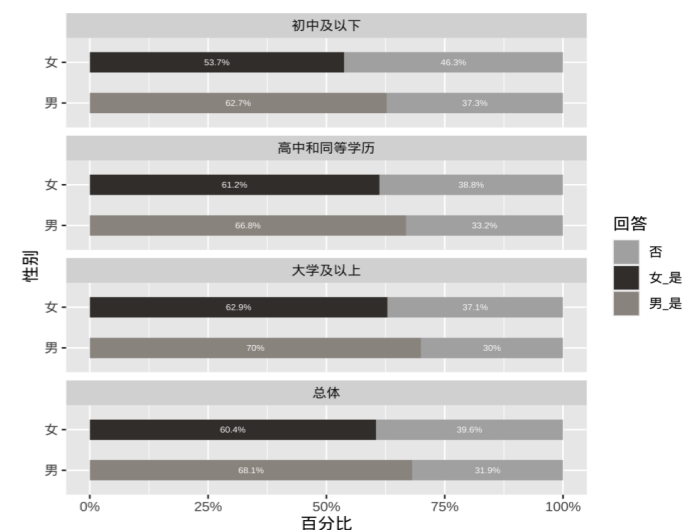


图2-3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对“我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回答对比

从不同年龄段来看，如图2-4所示，中年女性称自身“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比例最高（63.8%），高于青年女性（57.6%）和老年女性（54.3%）。而在男性中，老年群体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观感受比例最高（73.3%），近四分之三，在所有组别中最高。中年男性近七成称自身“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69.7%），青年男性感知较低（57.8%）。年轻女性和男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程度几乎相同，老年女性和老年女性的感知差别最大。

如图2-5所示，较低收入女性受访者最低比例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61.7%），中等收入女性（66.4%）与较高收入女性（67%）主观感知度近似。男性中，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度与收入水平呈反比：较低收入男性超七成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70.6%），中等收入男性其次（69.1%），较高收入男性（67.4%）与女性感知（67%）程度相似。

从不同职业群体看，除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女性更低比例认为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政府和退休、农民中男性女性差距最明显。如图2-6所示，三分之二自由职业女性受访者（66.3%）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比例最高；商业/职业女性（63.8%）、政府/国企/公务员女性（63.2%）其次；退休待业与农民女性主观认知最低。男性中，政府/国企/公务员超过四分之三认同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影响（77.4%）；农民其次（71.6%）；男性学生认知比例（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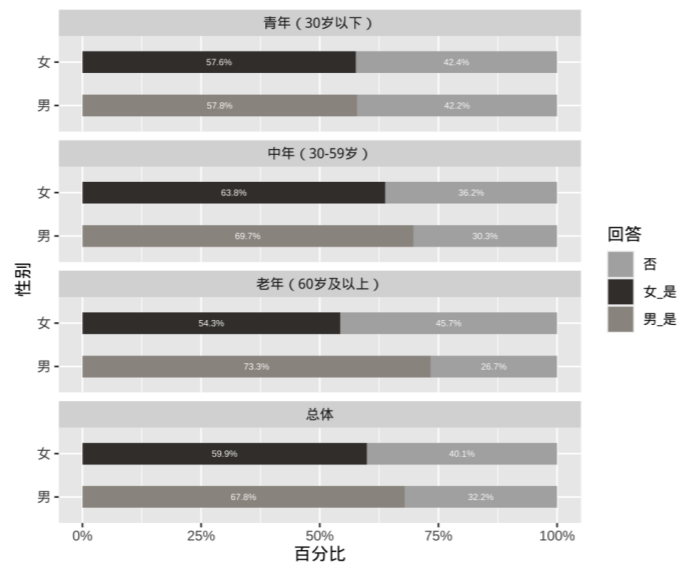


图2-4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我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回答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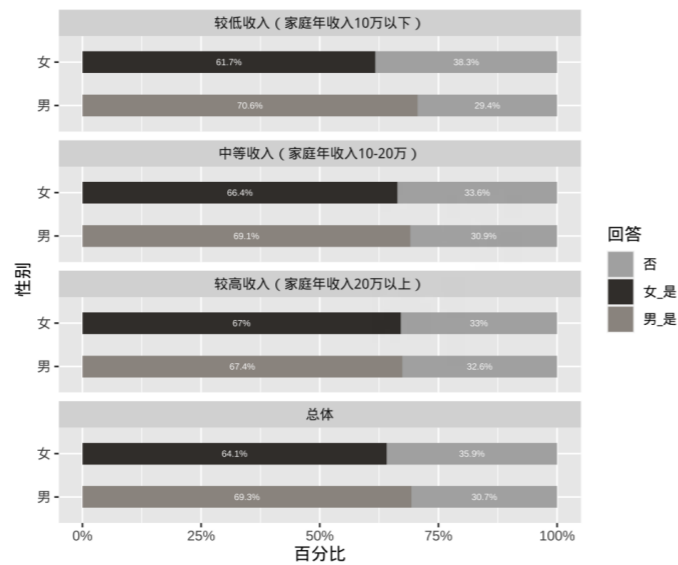


图2-5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对“我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回答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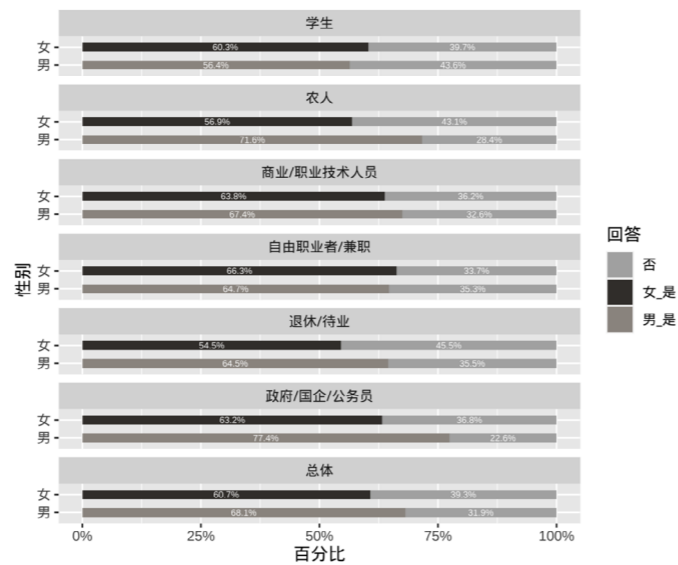


图2-6 不同职业受访者对“我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回答对比

二、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认知比例更高，对动植物影响认知男女差异显著

如图2-7所示，男性和女性受访者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造成的影响最大，其次依次为对子孙后代、中国人以及自身和家庭的影响。这表明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仍以自然系统为主，尚未充分内化为对自身或家庭利益的直接关切。女性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各主体的伤害“中等”和“很大”的比例均略高于男性受访者，且经过卡方检测，女性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显著高于男性。女性中近三分之二受访者（65.7%）认为气候变化会对动植物造成“很大”影响，高于男性的59.7%。进一步来看，女性中仅有2.9%认为“根本没有”影响，14.9%认为“有一点”影响，17.4%认为“中等”程度影响，表明女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风险感知较高。相比之下，男性中有3.2%认为“根本没有”伤害，15.4%认为“有一点”，21.7%认为“中等”程度。

在对子孙后代的潜在影响上，女性中有近六成（58.8%）认为“很大”，与男性的58.5%几乎持平。细分来看，女性中五分之一（21.2%）受访者认为“中等”16.6%认为“有一点”，有3.5%认为“根本没有”影响；男性中分别为22.3%（中等）、15.8%（有一点）、和3.4%（根本没有）。虽然总体差异较小，但女性略多地感受到代际层面的气候风险。

在“气候变化会伤害本国”这一项中，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回答近似。约三成女性（31.9%）和男性（31.2%）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近四分之一女性（24.2%）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人伤害中等，略高于男性（23.3%）受访者。四成女性（40%）和男性（40.9%）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人有一点影响。整体上，女性对“气候变化会伤害本国”的认知略高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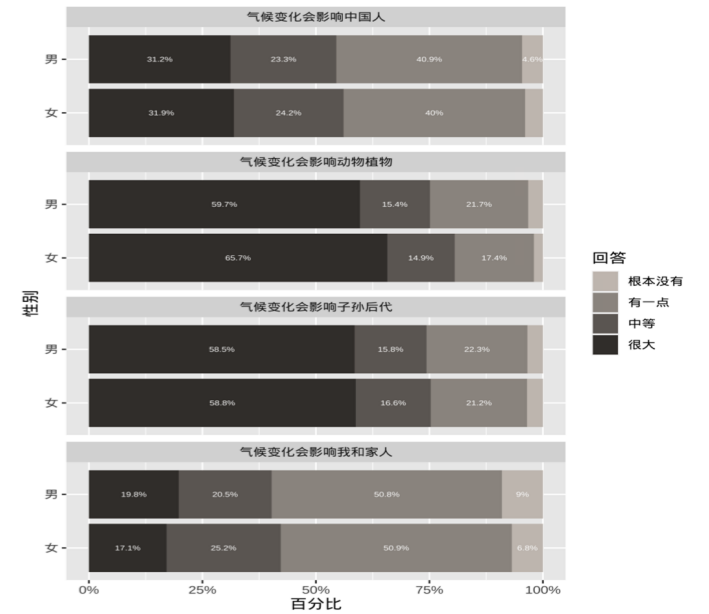


图2-7 男女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各方面影响的认知

在评估气候变化是否会对“我和家人”造成伤害时，男性中有近五分之一（19.8%）认为伤害“很大”，略高于女性（17.1%）。四分之一女性认为气候变化对我和家人有中等影响（25.2），略高于男性（20.5%）。一半的女性（50.9%）和男性（50.8%）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我和家人“有一点”影响。女性中有6.8%认为“根本没有”影响，男性中有9%认为“根本没有”。这说明尽管女性总体对“我和家人”的强烈风险感知稍弱，但对轻微或中等风险的认知更敏感。

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男性女性受访者对于气候变化的风险也有差异。以气候变化对动植物物种影响这一有显著差异的问题为例，如图2-8所示，城市女性对气候变化“很大”和“中等”程度影响动植物的认同最高（84.6%），城市男性其次（78.1%）。农村女性略低于城市女性和男性，约四分之三（74.2%）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的影响。农村男性认知度最低（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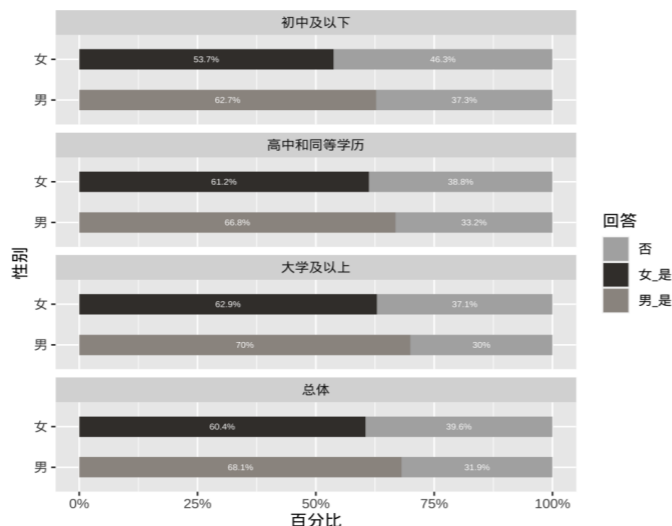


图2-8 城乡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的对比

如图2-9所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女性在各教育水平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均高于男性：近九成（86.3%）大学学历以上女性认为气候变化会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影响，同等教育水平中79.2%男性持此观点。高中学历女性77%持此观点，略高于同学历男性（69.7%）。初中及以下女性（69.2%）和男性（66.9%）受访者持此观点比例在近七成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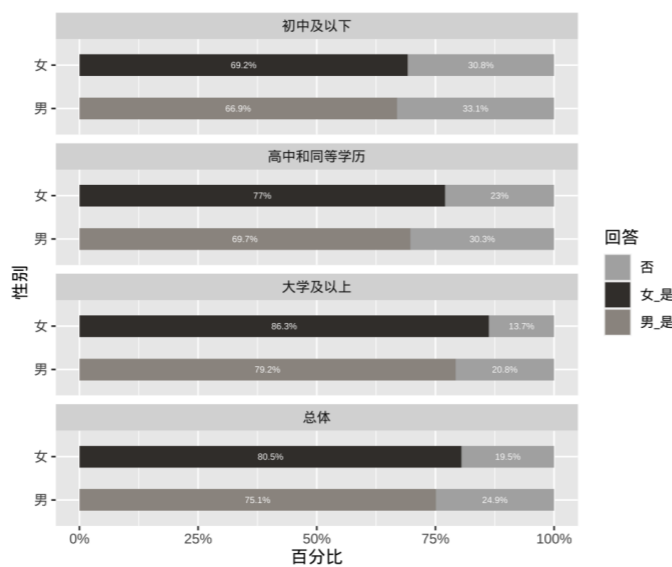


图2-9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的对比

如图2-10所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年龄段升高而下降，女性在各年龄段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均高于男性：近九成（88.7%）青年女性认为气候变化会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影响，在所有去年体重最高，同等教育水平中八成（81.2%）男性持此观点。中年女性80.3%持此观点，略高于中年男性（73.6%）。老年受访者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认同度最低，老年女性（71.9%）和男性（70.2%）受访者持此观点比例在近七成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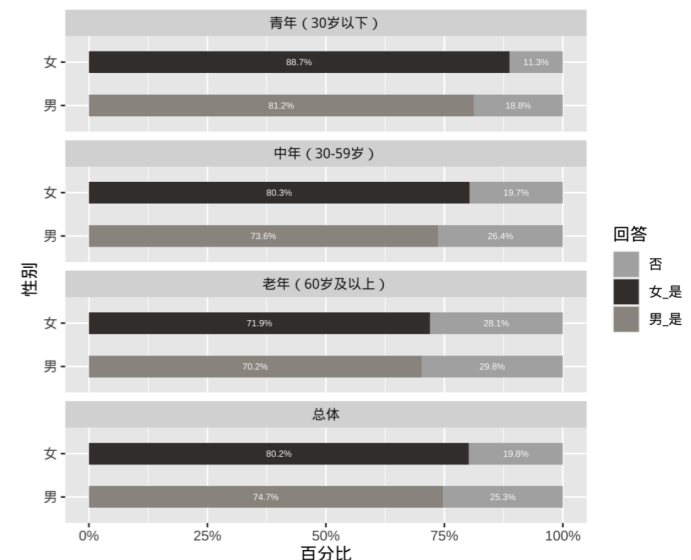


图2-10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的对比

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收入水平升高而升高，各收入水平差距较男性受访者更为显著。如图2-11所示，女性在所有收入水平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均高于男性：约九成（89.4%）较高收入水平女性认为气候变化会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影响，在所有群体中最高，且男女认知差距最大。中等收入水平女性81.7%持此观点，高于较高收入水平男性（78.2%）和中等收入水平男性（76.2%）。较低收入家庭女性（71.7%）和男性（71.4%）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影响认知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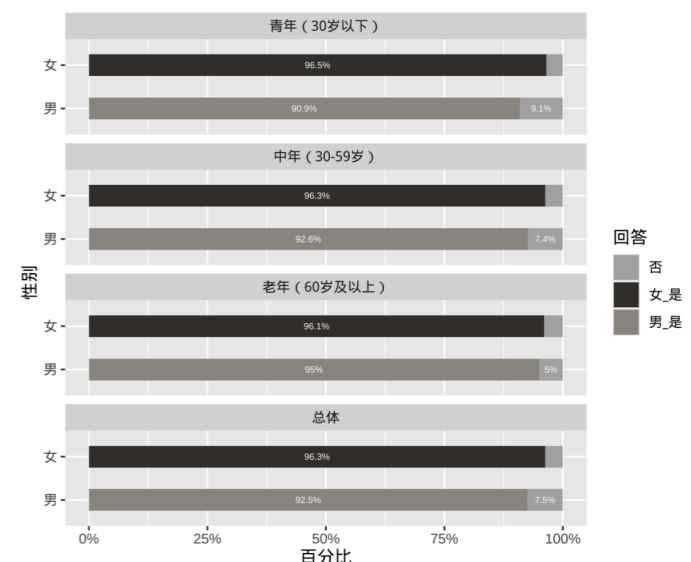


图2-11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的对比

如图2-12所示，女性在各职业上更高比例认同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总体高出男性五个百分点。学生、政府/国企公务员、自由职业者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度最高。九成（89.9%）女性学生认同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在所有群体中最高，高于男性学生84.6%。其次是女性自由职业者（86.4%），女性政府工作者（85.4%），和女性商业/专业技术人员（80.9%）。退休女性（74%）和农民女性（69.6%）对气候变化影响认知较低，在七成左右。男性受访者在不同职业上对此观点认同度趋势类似，除男性学生外均在七成左右，男性农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同度最低（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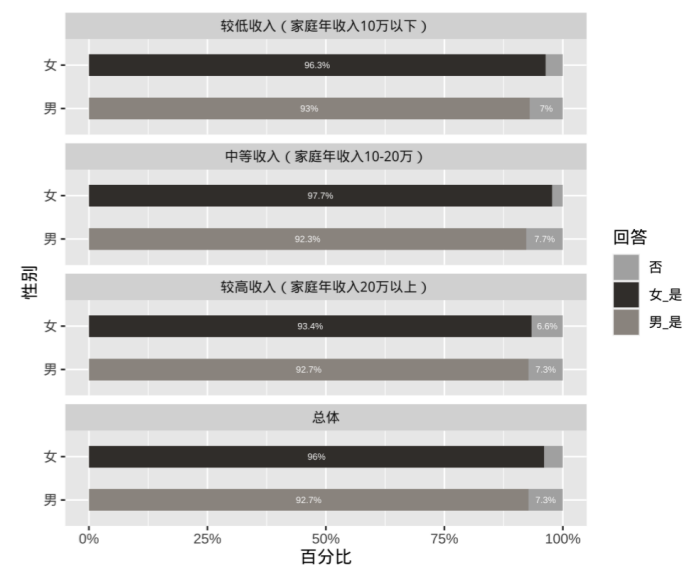


图2-12 不同职业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的对比

综上，女性较男性总体展现出对气候变化更高的风险感知。女性在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如动植物）和代际后代的影响方面认知更高，在涉及个人与家庭层面时则更多表达中等程度的担忧。城市、大学学历以上、青年、较高收入、学生女性群体是对气候变化影响认知最高的群体，男性中有类似趋势。

小结

- 女性在主观层面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相对较弱（认知低，经历了也不一定意识到）；
- 农村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观感知程度最低；
-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观感知整体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变强，男性在各教育水平的主观感知均高于女性；
- 中年女性称自身“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比例最高；
- 从不同职业群体看，除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外，女性更低比例认为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政府和退休、农民中男性女性差距最明显；
- 男性和女性受访者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造成的影响最大，其次依次为对子孙后代、中国人以及自身和家庭的影响。这表明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仍以自然系统为主，尚未充分内化为对自身或家庭利益的直接关切；
- 女性略多地感受到代际层面的气候风险；
-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女性在各教育水平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均高于男性；
-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年龄段升高而下降，女性在各年龄段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均高于男性；
- 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收入水平升高而升高，各收入水平差距较男性受访者更为显著；
- 女性在各职业上更高比例认同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总体高出男性5个百分点。

03

中国女性对双碳目标的认知度

本部分重点考察中国女性如下问题的认知模式：1) 对双碳目标的知晓度与接受度；2) 对双碳目标的支持程度；3) 对双碳目标实现的预期信心；4) 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使用的理解；5) 对未来中国使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规模的看法，并对比城乡、不同地区、年龄段、收入水平男性女性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知现状。

一、“是否听说过中国的双碳目标”现状

根据图3-1，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对碳中和目标的认知度显著低于男性。不到半数（47.3%）的女性表示听说过该目标，低于男性（62.4%）15个百分点。仍有半数女性（52.8%）未听说过碳中和目标，表明环保知识普及工作仍需加强，特别是针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差异化传播策略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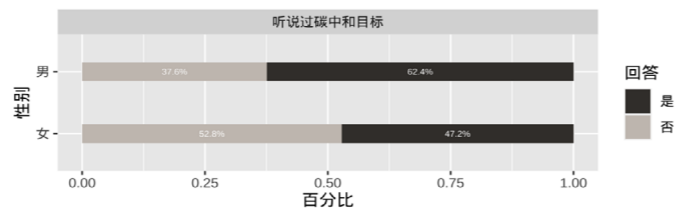


图3-1 受访者是否听说过中国的双碳目标的性别分布

根据图3-2，从性别视角来看收入水平对双碳认知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数据显示男性在各收入阶层的认知率均高于女性，其中高收入男性（80.6%）与高收入女性（59.7%）的差距高达20.9%，呈现出典型的“收入强化性别差异”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女性的认知率（36.6%）甚至低于中等收入男性（60.7%），反映出经济地位和性别因素的双重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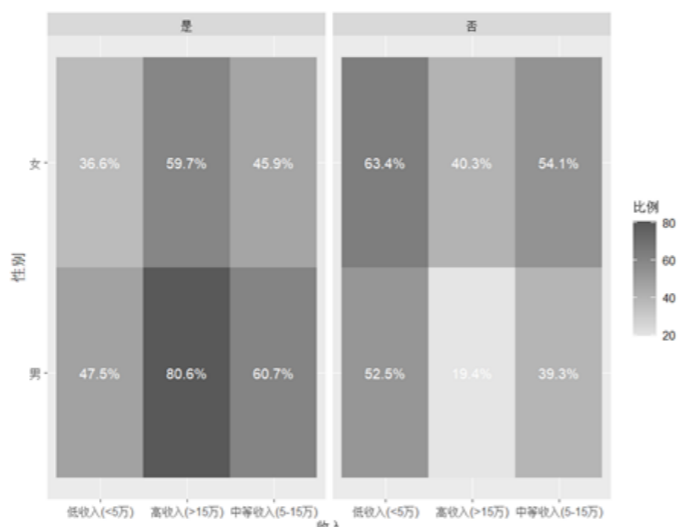


图3-2 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是否听说过中国的双碳目标的分布

二、对中国的双碳目标支持现状分析

（一）城乡男女受访者双碳目标支持现状分布

根据图3-3，从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双碳目标的支持度呈现出明显的“女性优势”特征，但这一优势在不同城乡群体中表现出差异化形态。在城市地区，女性展现出压倒性的政策支持，其“强烈支持”率（80.0%）不仅显著高于城市男性（77.4%），更创下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这种强势支持可能源于城市女性更高的环境意识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女性在“一般支持”维度同样保持高位（27.6%），形成“双高峰”支持结构，反映出该群体对双碳政策既抱有高度热情，又保持着理性评估的多元认知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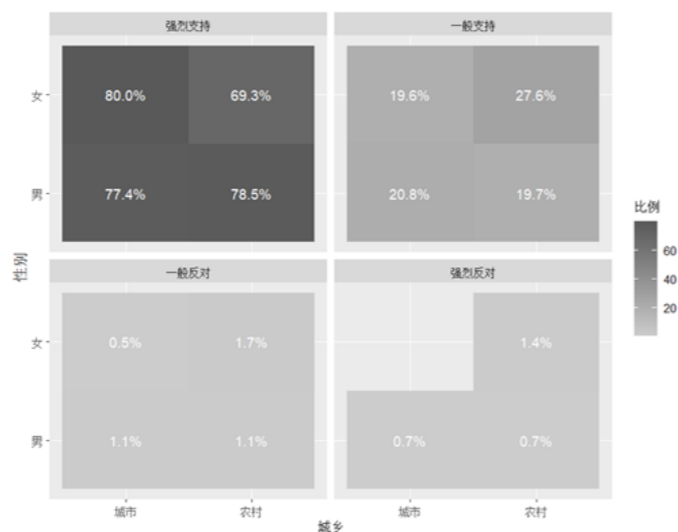


图3-3 城乡男女受访者是否支持中国的双碳目标
(注：空白处为交互作用后因样本量受限导致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

进一步分析反对意见可以发现，性别差异呈现结构性特征。男性在“一般反对”（城市1.7%，农村1.1%）和“强烈反对”（城乡均为0.7%）的比例普遍高于女性，其中城市男性反对声量最高（合计2.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女性成为反对率最低的群体（“强烈反对”仅0.7%），与城市女性（1.4%）形成鲜明对比。数据同时显示，城市女性的态度分布最为多元，在“强烈支持”（80.0%）和“一般支持”（27.6%）两个积极维度都保持高位，暗示城市女性群体对双碳目标既有高度认同又保持理性评估。

（二）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支持双碳目标现状分布

根据图3-4，从性别视角来看，收入水平对双碳目标的支持态度呈现出复杂的性别差异模式。数据显示，无论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男性在“强烈支持”维度均表现出高于同阶层收入的女性。这种差异在高收入中最为突出（男性81.2%，女性79.5%），高出6.1个百分点，形成明显的“男性优势”。差距达6.1个百分点；中等收入群体差距相对较小（男性76.2%，女性76.2%），但仍保持微弱优势；低收入群体中男性支持率（79.5%）同样高于女性（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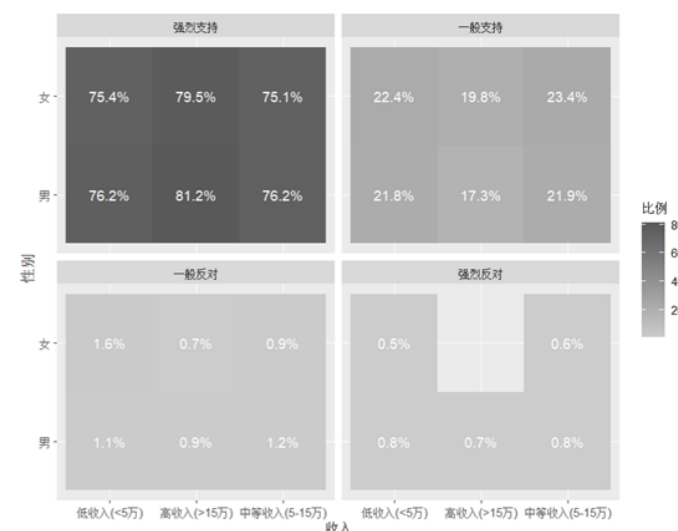


图3-4 不同收入男女受访者对中国的双碳目标支持现状的分布
(注：空白处为交互作用后因样本量受限导致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

三、受访者对“中国的双碳目标可否实现”的认知现状

(一) 城乡男女受访者认知现状差异

根据图3-5，从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信心，数据显示男性群体表现出更强的乐观态度，而女性则相对谨慎保守。在城市地区，男性认为“一定能实现”的比例达到65.3%，显著高于女性的57.0%；农村地区同样呈现这一趋势（男性67.5%，女性57.9%）。

进一步分析发现，尽管存在信心程度的性别差异，但消极态度（“不同能实现”和“不可能实现”）在男女群体中占比都很低（均低于1.5%），表明双碳目标已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男性的乐观程度最高（67.5%），这可能与其更直接感受到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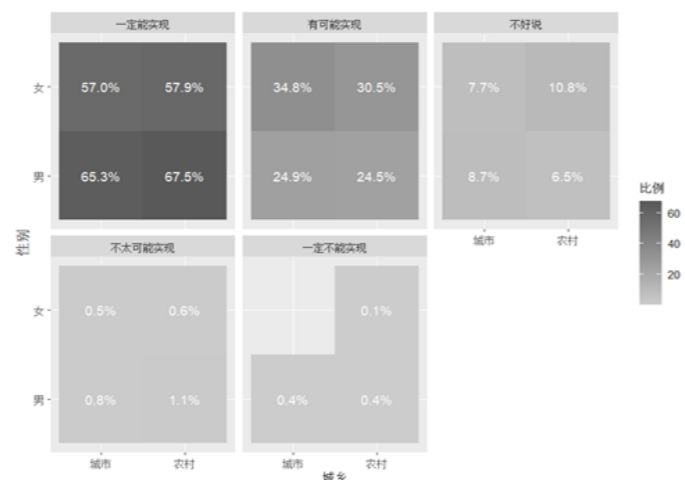


图3-5 城乡男女受访者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信心度
(注：空白处为交互作用后因样本量受限导致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

(二) 不同地区男女受访者认知现状差异

根据图3-6，从性别与地区交叉视角分析受访者对中国的双碳目标实现的信心，数据揭示了四个关键发现：一是地区发展水平强化实现双碳目标的信心性别差距。东部男性信心最高（“一定能实现”60.3%），较东部女性（55.9%）高4.4个百分点。二是中西部性别差距更显著（男69.5%，女58.6%），差值达10.9个百分点，反映欠发达地区男性更易感知基建投资带来的转型红利。三是女性态度呈现“区域趋同”特征。东西部女性信心差异仅2.7个百分点（东部55.9%，中西部58.6%），但男性区域差异达9.2个百分点，显示女性对双碳目标的判断更少受地域经济条件影响。四是消极认知的性别分化。男性“不太可能”实现的比例（东部0.9%）是女性（0.4%）的2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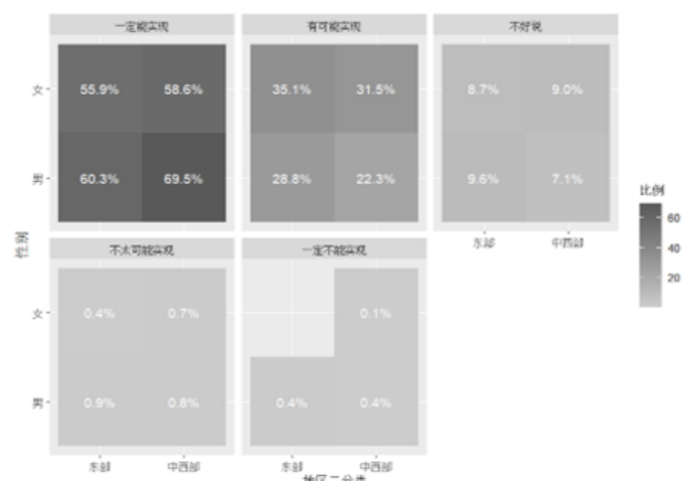


图3-6 不同地区男女受访者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信心度
(注：空白处为交互作用后因样本量受限导致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

四、受访者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态度的认知现状

(一) 城乡男女受访者认知差异

从性别和城乡交互数据看，男性女性都更倾向于支持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但仍有部分女性（如农村女性13.7%“多很多”）认为未来应该增加化石能源规模，这一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解释：

首先，经济依赖性视角。农村地区女性可能更直接依赖传统能源相关产业（如煤炭产区）维持生计，其家庭收入与能源行业密切相关。当面临经济压力时，保障就业和收入的现实需求可能暂时超越环境关切。数据显示农村女性支持“多一些”的比例（13.7%）显著高于城市女性（8.4%），印证了经济因素的关键影响。

其次，能源可及性差异。在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农村地区，女性作为家庭能源主要管理者，可能因清洁能源获取困难而更务实。当沼气、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供应不稳定时，增加传统能源供给成为保障家庭炊事、取暖等基本需求的现实选择。这种“能源贫困”情境下的性别化体验，导致部分女性采取实用主义立场。

第三，信息获取屏障。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可能导致部分女性群体（特别是低学历农村女性）接触不到完整的能源转型信息。研究显示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城市女性低1.8年，这可能限制其对能源政策环境效益的认知，从而延续传统能源依赖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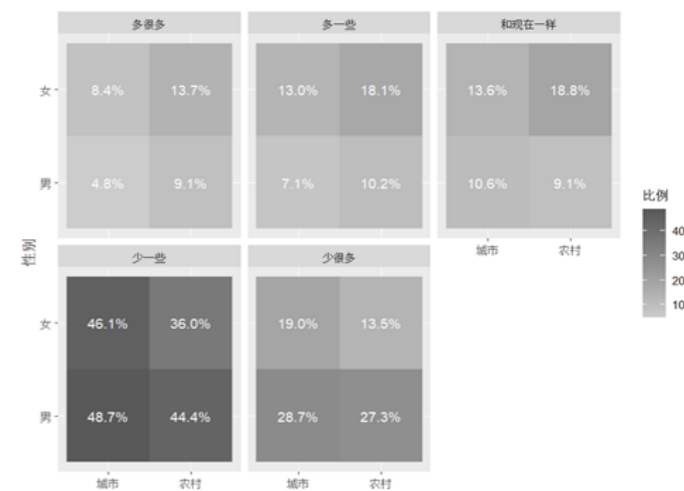


图3-7 城乡男女受访者对化石能源使用态度的现状分布

(二) 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认知差异

在图3-8中，可发现收入与性别交叉视角下的减碳态度差异。数据显示，各收入层级的女性支持减碳的比例均高于同收入男性，这一现象呈现出稳定的跨阶层特征。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女性“多很多”支持率（如7.3%）比同收入男性（3.6%）高出3.7个百分点，而低收入女性（16.4%）与男性（8.8%）的差距更为显著（相差7.6%）。这种系统性差异可能源于女性普遍更关注环境保护的长期效益和健康影响，低收入女性承担家庭能源管理责任，更直接感受到能源价格波动压力。而男性在新能源行业从业占比较高，更早接触转型红利，更可能从短期经济成本角度权衡减碳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提升，两性支持率的绝对值均有所增长，性别差距有缩小，说明经济地位改善性别认知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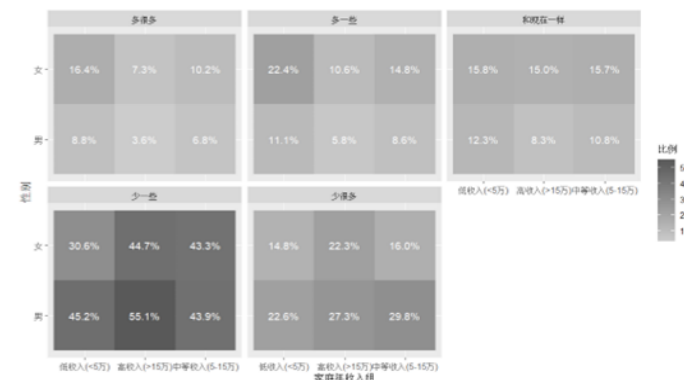


图3-8 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对化石能源使用态度的现状分布

（三）不同年龄男女受访者认知现状差异

根据图3-9，相较中老年女性，青年女性对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支持率高，能源转型存在性别化代际鸿沟。数据表明，青年女性（18-30岁）对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少一些”的支持率（47.6%）最高，高于同年龄段男性群体（41.5%），也远超61岁以上女性（32.1%）。61岁以上中老年女性支持维持/增加化石能源的比例（14.2%）大约是18-30岁（7.2%）女性2倍，反映出代际认知差异对性别态度的影响。

中老年女性群体因成长于高碳发展时期，其能源使用习惯更具惯性。这一代际差异特征揭示了能源转型中深层的性别化代际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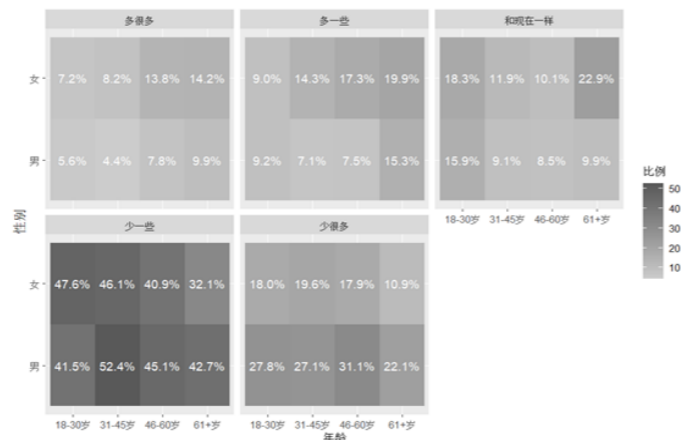


图3-9 不同年龄男女受访者对化石能源使用态度的现状分布

五、受访者对可再生能源使用态度的认知现状

（一）城乡男女受访者认知现状差异

从性别与城乡交叉视角分析可持续能源使用态度，数据呈现出性别差异逆转的显著特征。与传统能源态度相反，男性对增加可持续能源使用的支持度显著高于女性。城市男性支持“多很多”的比例达74.2%，比城市女性（65.8%）高出8.4个百分点；农村男性（70.2%）也比农村女性（53.9%）高出16.3个百分点（图10）。这种逆转可能原因为：一是男性在新能源行业从业占比更高（约占63%），更了解技术发展；二是女性对技术快速推广可能带来的成本分摊更为谨慎；三是城乡差异的性别不对称性。农村女性成为最保守群体，支持维持现状（“和现在一样”）的比例达8.0%，是城市男性（3.2%）的2.5倍。城市男性表现出最强改革意愿，“少很多”选项仅0.8%，显示其认为现有转型速度仍不足；四是态度分布呈现“双峰”结构。城市群体集中在“多很多”（男74.2%/女65.8%）和“多一些”（男20.7%/女29.9%）；农村群体则呈现“多很多”（男70.2%/女53.9%）与“和现在一样”（男25.9%/女35.1%）两极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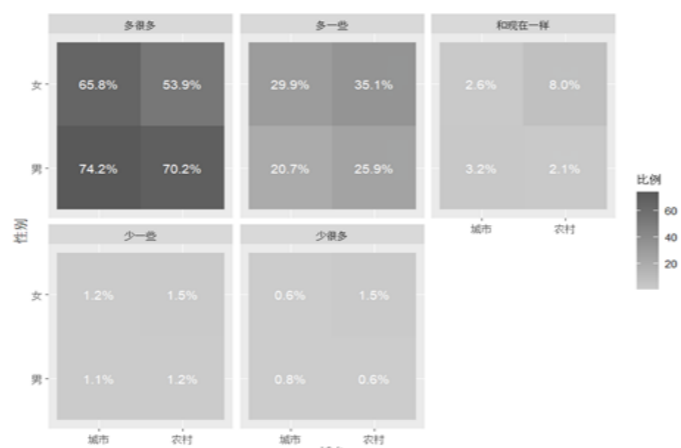


图3-10 城乡男女受访者对可持续能源使用态度的现状分布

（二）不同年龄段男女受访者认知现状差异

从性别和年龄交叉视角分析可持续能源的使用态度，可以观察到以下关键差异和趋势：女性对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多很多”支持率，在各个年龄段的比例均低于男性。例如，受访者中认为应“多很多”的男性比例在18-30岁为70.4%，女性为62.7%，男性比例在46-60岁的为71.8%，女性为63.2%。女性更倾向于谨慎选择。女性对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多一些”支持率的相对较高，尤其在中青年女性群体中，女性支持“多一些”的比例高出男性较多。在61岁以上群体中，女性支持“多一些”的比例达35.3%，男性为31.3%。

从年龄与性别的交互影响看，年轻群体性别差异较小。18-30岁群体中，男女对“多一些”的支持差距较小（男76.1%，女67.2%）。老年女性更保守，61岁以上女性对可再生能源的保守态度（“少一些”）为2.2%，而男性为0.8%，可能与性别角色或信息接触差异有关。

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方面：一是社会角色影响。男性可能更关注技术发展和经济收益（如新能源产业），女性可能更关注稳定性或对现有能源的依赖。二是信息获取差异。男性可能更多接触可再生能源的积极宣传，而女性对潜在风险（如设备成本、稳定性）更敏感。三是政策参与度。男性在能源决策中的参与度可能更高，导致支持倾向更强。

未来推广可再生能源时，需针对性别的态度差异制定策略：针对女性群体，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经济性宣传，突出其家庭成本节约和社会效益。针对男性群体，强调技术领先性和产业机会，巩固其支持。针对老年女性重点沟通，通过社区教育减少其对能源转型的顾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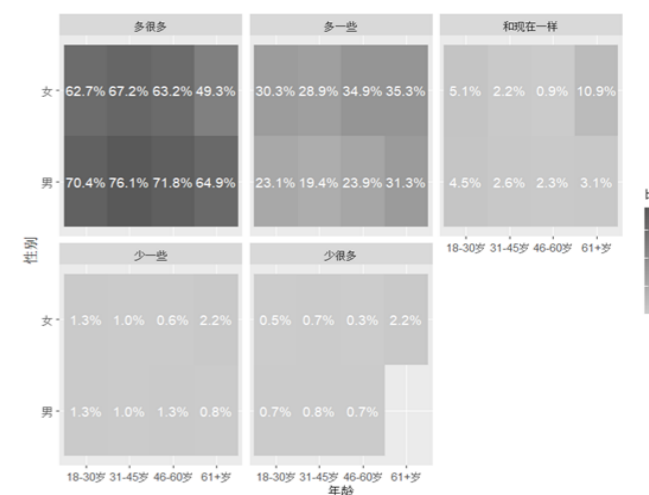


图3-11 不同年龄段男女受访者对可持续能源使用态度的现状分布
(注：空白处为交互作用后因样本量受限导致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

（三）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认知差异

■ 从性别和收入交互视角分析图表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男性对“多很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规模的支持率普遍高于同收入阶层女性，尤其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差距更大（男71.4%，女58.7%）。而高收入男性支持“多很多”的比例达79.4%，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可能与对技术发展和环保责任的关注相关（图3-12）。

女性在“多一些”使用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支持上均高于同收入阶层的男性。从性别与收入的交互作用看，低收入女性最不积极，对“多一些”的支持率最低（58.7%），且“少一些”比例相对较高（2.2%），可能与经济压力下的保守倾向有关。性别差距随收入增加缩小。低收入群体中，性别差距较大（男71.4%，女58.7%）。高收入群体中，差距缩小（男79.4%，女71.1%），显示经济水平可能部分抵消性别差异。

最支持扩张可再生能源的规模使用的群体为高收入男性（79.4%）。最保守的群体是低收入女性（仅58.7%支持“多一些”）。可见，关键矛盾点是收入而非性别，但性别差异在低收入群体中尤为显著。需通过经济激励和针对性沟通缩小态度差距。为此，针对低收入女性，提供补贴或分期支付方案，降低参与门槛。针对高收入男性，鼓励其作为“绿色技术早期采用者”示范引领。同时，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宣传（如长期节省电费），弱化性别和经济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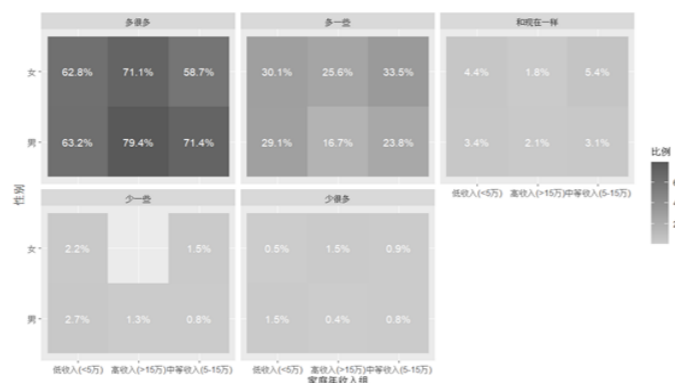


图3-12 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对可持续能源使用态度的现状分布
(注：空白处为交互作用后因样本量受限导致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

小结

- 女性对双碳目标的认知率（47.3%）显著低于男性（62.4%），男性在各收入阶层的认知率均高于女性，其中高收入男性（80.6%）与高收入女性（59.7%）的差距高达20.9个百分点，呈现出典型的“收入强化性别差异”现象，反映出男性更易感知转型红利而女性持审慎态度，需建立性别差异化的政策沟通机制；
- 公众对实现双碳目标的信心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性（城市65.3%/农村67.5%）比女性（城市57.0%/农村57.9%）表现出更强信心，这种差异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中西部性别差达10.9个百分点），反映出环境政策传播中亟待解决的性别差异化沟通问题；
- 公众对化石能源使用态度的认知现状，从性别和城乡交互数据看，男性女性都更倾向于支持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从性别和收入视角看，各收入层级的女性支持减碳的比例均高于同收入男性，这一现象呈现出稳定的跨阶层特征；
- 从性别和年龄交叉视角看，相比较中老年女性，青年女性对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支持率高，出现能源转型的性别化代际鸿沟；
- 从性别和城乡交叉视角看，男性对增加可持续能源使用的支持度显著高于女性。农村女性成为最保守群体，态度分布呈现“双峰”结构；
- 从性别和年龄交叉视角看，男性对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多很多”支持率更高，在各个年龄段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年轻群体性别差异较小，老年女性更保守。从性别和收入交互视角看，男性对“多很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规模的支持率普遍高于同收入阶层女性。

04

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执行度

基于可持续消费行为意愿、个人环保生活方式、公众气候变化行动、践行低碳生活的阻碍四个板块的问卷问题，呈现中国女性应对气候变化个人行动的意愿和执行程度，并从城乡、教育水平、年龄段、收入水平、职业上呈现男女受访者的行动现状与卡点。总体看来，女性愿意为气候友好额外花钱的意愿较高，但在最高比例的溢价支付意愿上低于男性。在部分环保生活方式上女性践行较好，如低碳出行、循环利用旧衣物，但公众领域的气候变化行动（如参与低碳活动、转发社交媒体上的气候变化信息、鼓励他人践行气候友好行动）参与度普遍低于男性。女性对于践行低碳生活的阻碍，如识别低碳产品、购买渠道、价格更贵等，有更强的感知。

一、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支付意愿上男女有显著差异

■ 购买气候友好产品（对减缓气候变化有贡献的产品，如风能、太阳能产品等）往往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也被称为溢价。这不仅因为其在研发、生产或技术上的成本较高，也因为传统高碳产品未体现其对环境的全部负面影响（即“外部性”）。在购买气候友好产品的支付意愿上，女性总体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略高，但男性花最高额溢价的比例更高。如图4-1所示，五分之一（22.5%）的男性受访者愿意花三成以上更多的钱购买环保产品，比女性高出近10个百分点（13%）。但在其他愿意支付的溢价水平上，女性均略高：16.4%愿意支付三成的溢价，与男性类似（15.6%）；四分之一的女性愿意支付二成的溢价（25.3%），高于男性（22.5%）。30%女性愿意支付一成的溢价，约四分之一（24.8%）男性愿意支付一成溢价，显示一成溢价是最多受访者愿意支付的溢价水平。约15%的受访者不愿意支付溢价（14.7%男性与15.4%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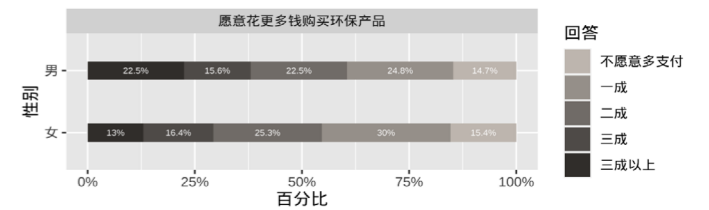


图4-1 男女受访者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溢价支付意愿对比

■ 从城乡差异看，城市女性是所有群体中支付意愿最强的：如图4-2所示，仅有11.8%城市女性不愿意支付任何溢价，而农村中女性不愿意支付比例最高（20.9%）。城市女性中，超过一半表示愿意多花超过10%的钱购买环保产品，其中28.3%愿意多花11-20%，18.4%愿意多花21%-30%，但仅12.6%愿意多花30%以上。城市男性中，愿意支付最高额溢价的（21.4%）高于城市女性（12.6%）。而农村女性对于多付一成价格购买气候友好产品接受度则较高（31.9%），对更高额的溢价接受度较低，其中20.4%愿意多花11-20%，13.1%愿意多花21%-30%、13.6%愿意多花30%以上。农村男性愿意支付最高额溢价比例（24.9%）明显高于农村女性（13.6%）。男性群体中，城市男性愿意支付（不愿意的比例为15.5%）的比例略低于农村男性（不愿意的比例为12.9%）在最高支付幅度（21%-30%及以上）上支付意愿也略低于农村男性。女性在城市和农村中均表现出较男性更高的气候友好产品支付意愿，但在最高支付幅度（21%-30%及以上）上支付意愿低于男性受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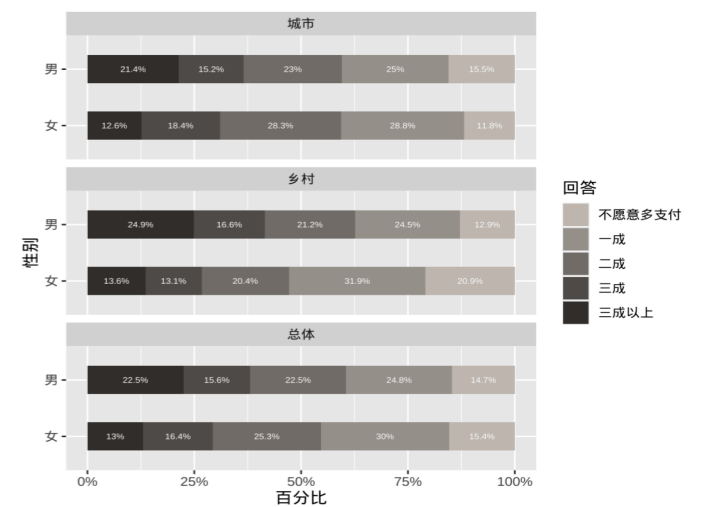


图4-2 城乡受访者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溢价支付意愿对比

■ 如图4-3所示，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整体随教育水平而上升：大学以上女性不愿意支付的比例11.6%在所有组类中最低，高中学历女性不愿意支付溢价比例13.8%，初中以下女性不愿意支付比例26.6%在所有组类中最高。大学以上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高于大学以上男性，但其他教育水平上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低于同教育水平男性。在最高溢价水平上（多花30%及以上）各教育水平女性均低于男性近个百分点(大学及以上男20.6%,女12.6%；高中男25.1%，女14.7%；初中及以下男24.9%，女12.9%)。男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随教育水平变化没有女性那么明显，且没有固定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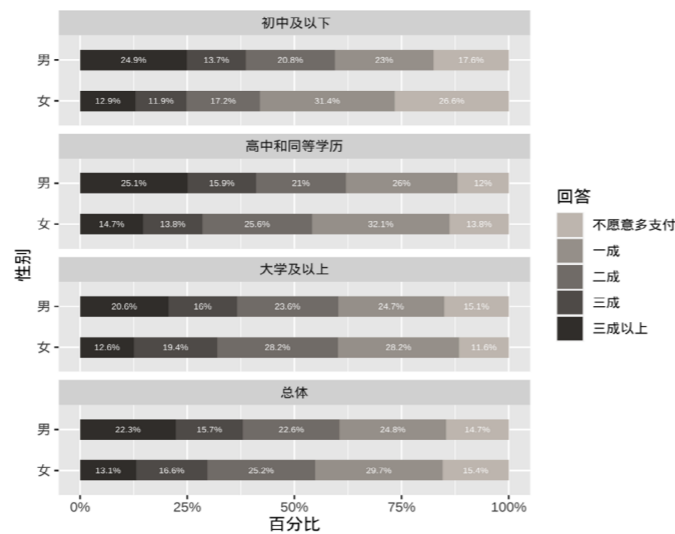


图4-3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溢价支付意愿对比

■ 如图4-4所示，女性为气候友好产品支付溢价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而男性则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青年女性仅有8.7%不愿意支付溢价，在所有群体中最低；中年女性其次，有12.2%不愿意支付溢价；老年女性中有27%不愿意支付溢价，在所有群体中最高，与其他年龄段女性的支付意愿有明显差距。相比之下，男性各年龄段支付意愿差距较小，老年男性不愿意支付比例最低（13.8%），中年男性其次（14.6%），年青男性再次（15.8%）。在愿意多花21%及以上最高两档溢价水平上，老年男性愿意支付比例在所有群体中最高（32.8%和14.4%），是老年女性两倍以上（12.1%和10.7%），中年男性其次（23.7%和15.6%），高于中年女性（14.1%和17.4%）。青年女性愿意多花21%及以上的比例（12.9%和20.1%）略高于青年男性（14.3%和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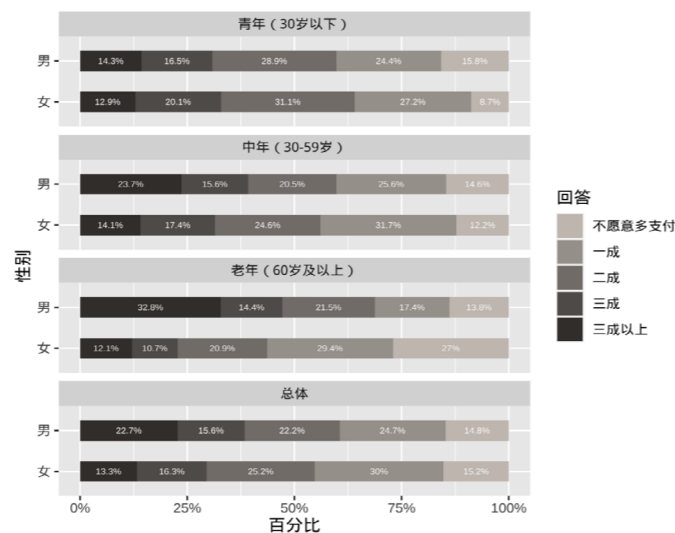


图4-4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溢价支付意愿对比

■ 从收入水平上看，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水平随收入增高而升高，而男性受访者愿意支付的比例在中等收入男性受访者中最高。如图4-5所示，男性在各收入水平上，愿意花21%及以上溢价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在较低收入群体中最明显（男性26.4%和16.4%，远高于女性14%和12.6%），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差距最小（男性22.6%和15.3%，略高于女性16.6%和19.4%），较高收入群体中其次（男性23.1%和17.3%，略高于女性13.4%和22.9%）。多花10%-20%的钱是所有收入水平上女性受访者愿意支付比例最高的两个溢价支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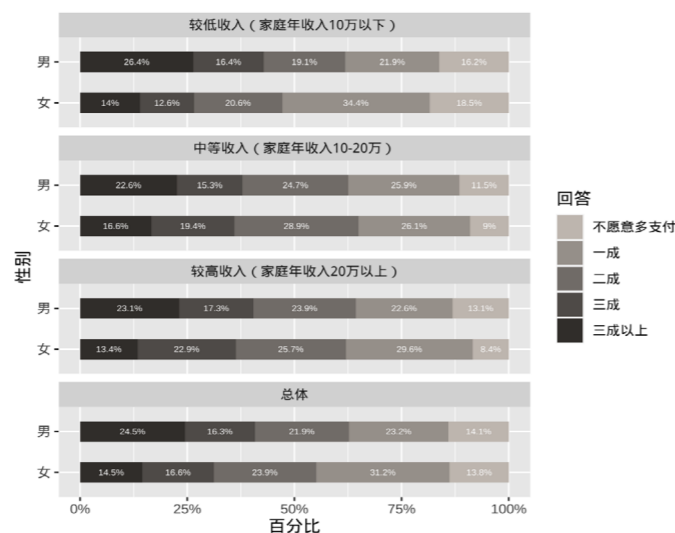


图4-5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溢价支付意愿对比

■ 如图4-6所示，不同职业中，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均高于同职业男性，农民和退休待业群体除外。而男性受访者愿意支付的比例在中等收入男性受访者中最高。男性在各职业中，愿意花21%及以上溢价的比例均高于同职业女性，但在学生和政府/国企/公务员中男性与女性愿意支付的比例类似。在农民群体中最明显（男性26.2%和16%，远高于女性12.5%和9.5%），退休/待业群体中也较明显（男性24.1%和15.2%，远高于女性13.9%和12.1%）；在学生群体中差距最小（男性15.9%和17.4%，基本持平女性14.6%和19.6%），政府/国企/公务员群体中其次（男性20%和19.7%，略高于女性13.5%和24%）。商业/职业技术人员与自由职业者的支付意愿较为近似。多花10%-20%的钱是各职业女性受访者愿意支付比例最高的两个溢价支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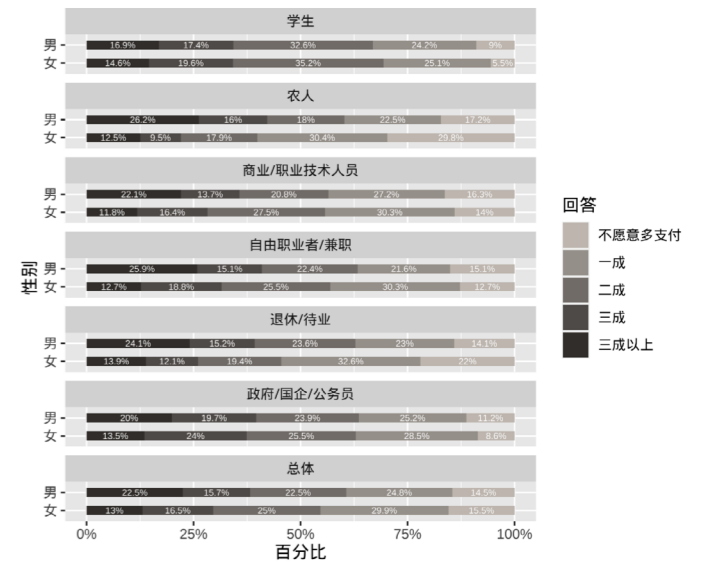


图4-6 不同职业受访者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溢价支付意愿对比

二、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支付意愿上男女有显著差异

■ 与溢价购买气候友好产品意愿类似，女性总体愿意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比例更高，但男性花最高额的比例更高。如图4-7所示，约四分之一女性（24.1%）受访者愿意花480元100%抵消个人出行产生碳排放量，而约三成（29.9%）男性愿意支付此价格，是男性受访者中支付愿意比例最高的一个价格水平。22.8%女性愿意花240元抵消个人出行产生碳排放量的50%，略高于男性（20%）。18%女性愿意花120元抵消个人出行产生碳排放量的25%，此价格水平上与男性受访者支付意愿类似（16.6%）。超四分之一女性（27.5%）愿意花60元抵消八分之一个人出行产生的碳排放量，是女性受访者中支付愿意比例最高的一个价格水平。不愿意支付的男性受访者(12.6%)比不愿意支付的女性受访者(7.6%)高出五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女性愿意支付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比例高于愿意支付溢价购买气候友好产品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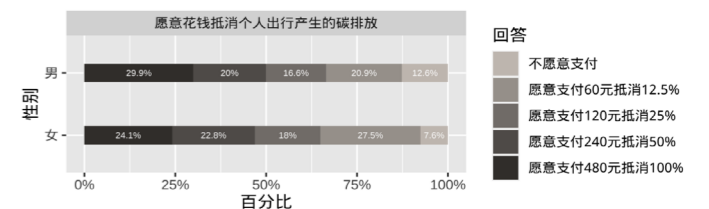


图4-7 男女受访者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意愿的对比

从城乡差异看，女性在城市和农村中均表现出较男性更高的支付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意愿。如图4-8所示，农村女性是所有群体中支付意愿最强的，仅有5.8%不愿意支付任何溢价，城市女性不愿意支付比例为8.8%。城市女性中超过一半表示愿意多花240-480元/年抵消出行的碳排放，其中24.7%愿意多花480元，25.6%愿意多花240元，高额支付意愿较强。城市男性中愿意支付最高额抵消的比例（30.6%）高于城市女性（24.7%）。农村女性最高额支付意愿略低：23.2%愿意多花480元，18.3%愿意多花240元接受度较高。有超过三分之一农村女性愿意多花60元/年抵消碳排放，是接受比例最高的支付额度。农村男性中愿意支付最高额溢价的比（28.5%）高于农村女性五个百分点。男性群体中，城市男性愿意支付（不愿意的比例为12.2%）的比例略低于农村男性（不愿意的比例为13.6%），在最高支付幅度（480元）上支付意愿（30.6%）也略高于农村男性（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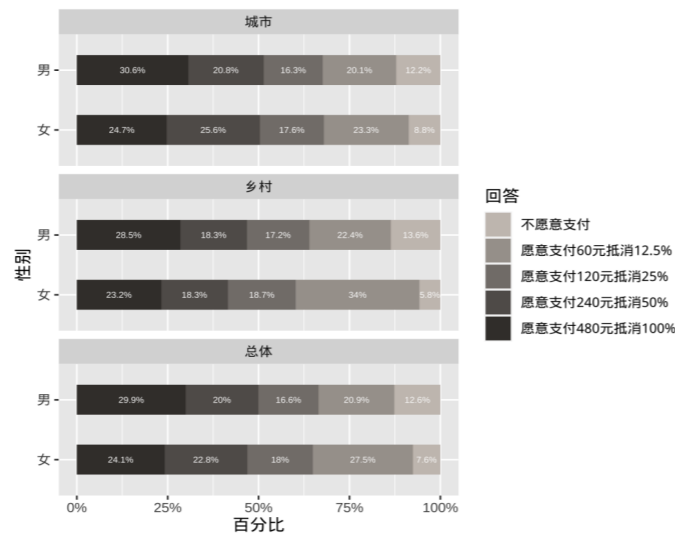


图4-8 城乡受访者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意愿的对比

与购买气候友好产品的支付意愿不同，花钱抵消个人碳排放没有固定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初中以下女性不愿意花钱抵消个人碳排放的比例5.8%，在所有组类中最低，大学以上女性不愿意支付的比例7.7%，高中学历女性不愿意支付溢价比例8.7%。各教育水平上女性愿意花钱抵消的比例高于同等教育水平男性。在最高溢价水平上（多花480元/年）各教育水平女性均略低于男性，愿意花钱抵消的比例随学历水平增长（大学及以上男27.7%，女20.7%；高中男27.7%，女20.7%；初中及以下男23.5%，女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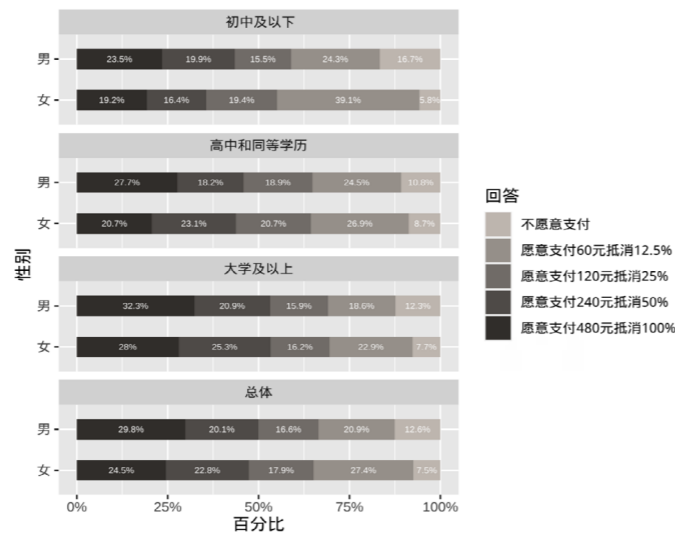


图4-9 不同教育水平受访者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意愿的对比

如图4-10所示，老年女性受访者的支付意愿最高：老年女性中有3.5%不愿意支付碳排放抵消，在所有群体中最低；青年女性其次，仅5.2%不愿意支付碳排放抵消；中年女性是支付意愿最低的，有9.8%不愿意支付碳排放抵消。但青年女性愿意支付高额抵消的比例最高：超过三分之一青年女性（34.2%）愿意花480元，近三成青年女性（29.9%）愿意花240元，比例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青年男性29.1%愿意花480元，24.8%愿意花240元）。在中年和老年中，男性愿意支付高额抵消的比例高于女性，且差距在老年群体中更明显。各年龄段中女性比男性总体支付意愿更高。老年女性有四成愿意花60元/年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是愿意支付比例最高的一个额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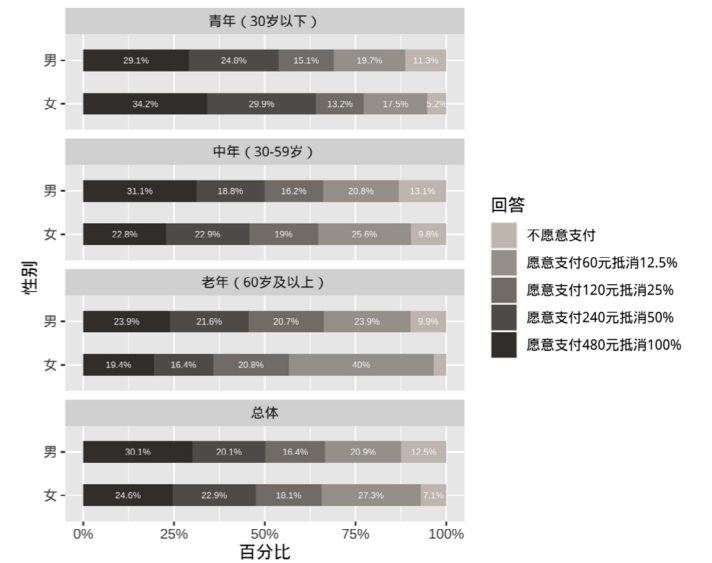


图4-10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意愿的对比

从收入水平上，女性愿意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水平随收入增高而升高：如图4-11所示，较高收入女性仅3.8%不愿意花钱，在所有群体中最低；中等收入女性仅4.6%不愿意花钱；较低收入家庭7.8%不愿意花钱。而男性受访者愿意支付的比例在中等收入男性受访者中最高（8.6%不愿意花钱），较高收入家庭其次（11.4%不愿意花钱）。如图所示，男性在各收入水平上，愿意花480元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在较高收入群体中最明显（男性40.9%，高于女性30.8% 十个百分点），在较低收入群体中差距最小（男性23.7%，女性21.5%），中等收入群体中其次（男性34%略高于女性28.1%）。女性整体对于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意愿较高，超过六成较高收入女性愿意花240元/年及以上抵消至少一半的个人出行碳排放，中等收入女性中该比例也达到56.2%。较低收入女性对花60元/年的支付意愿最高（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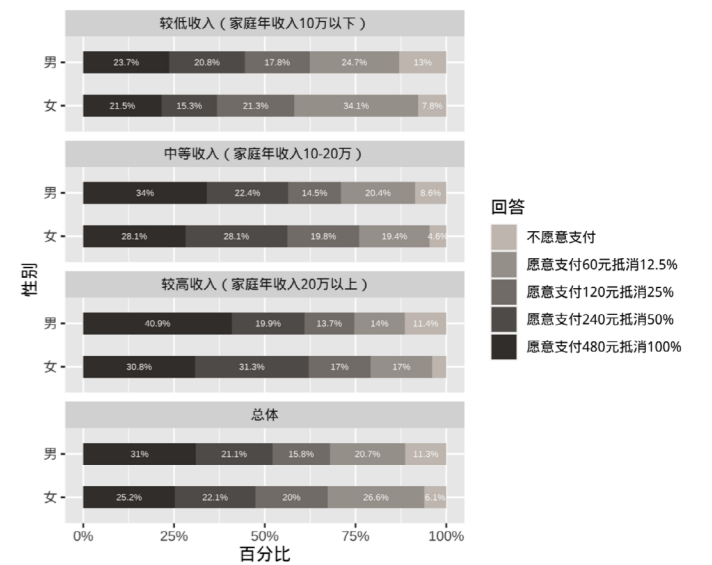


图4-11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意愿的对比

■ 如图4-12所示，不同职业中，女性愿意花钱抵消个人碳排放的比例均高于同职业男性，但男性愿意花480元最高额比例均高于同职业女性，学生群体除外。女性学生中，超过七成愿意花240元/年及以上抵消至少一半的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比例最高（36.5%愿意花480元，36.1%愿意花240元）。自由职业者和政府/国企/公务员中女性愿意花240元及以上的比例也较高，约五成。商业/专业技术人员（23.1%愿意花480元，23.3%愿意花240元）和退休/待业女性（20%愿意花480元，19.8%愿意花240元）愿意花240元及以上的比例在四成左右。农民群体中女性愿意花240元及以上的比例较低（16.9%愿意花480元，12.4%愿意花240元），但对花60元/年的意愿较高（42.9%）。花480元和60元是女性受访者整体愿意支付比例最高的两个价格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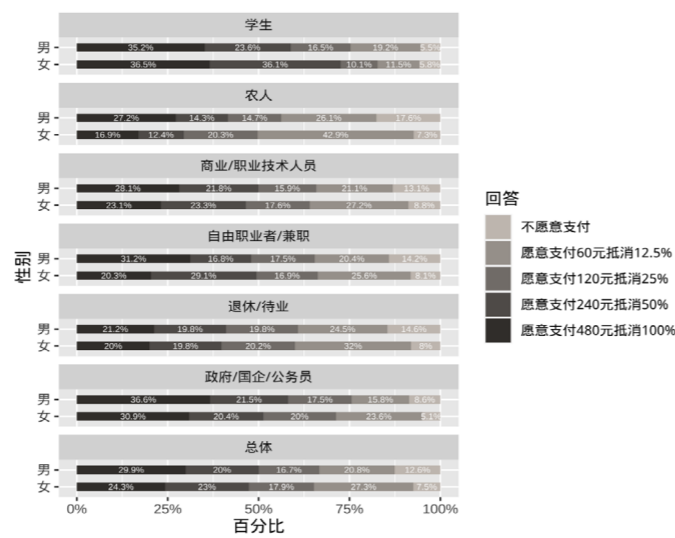


图4-12 不同职业受访者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意愿的对比

三、男女受访者在环保生活方式行为上差异

本部分呈现男女受访者对于以下9项环保生活方式行为的实践频率。受访者自我评估对该行为的实践频率，从最低频率“从不”（量表得分为1）到最高频率“总是”（量表得分为5）。这9项行动覆盖了个体在消费选择、资源使用、出行方式、食品浪费与废弃物处理等多个维度，如消费（买或不买）、资源使用（节电）、出行（低碳出行）、饮食（减少浪费）与再利用（衣物循环）等。这些行动属于日常生活中可操作的实践，便于受访者回忆与报告，适合用于大规模问卷调查。这些行动与气候变化直接或间接相关，能够体现环保意识和低碳生活方式的总体倾向。这些行为大多已被政策文件、社会倡导或环保宣传作为日常减碳的重点内容，具有政策与教育可推广性。

■ 如图4-13所示，节约用电、低碳出行、避免食物浪费、和垃圾分类是受访者整体践行率最高的环保行为。这几项行为是公众环保倡导比较常见的行动，理念的普及与基础设施条件较成熟，说明已在中国公众当中被广泛接受。公众整体购买承诺碳中和的产品践行度较低，使用一次性用品等频率较高，这些行为可能更加陌生和困难，需要被更多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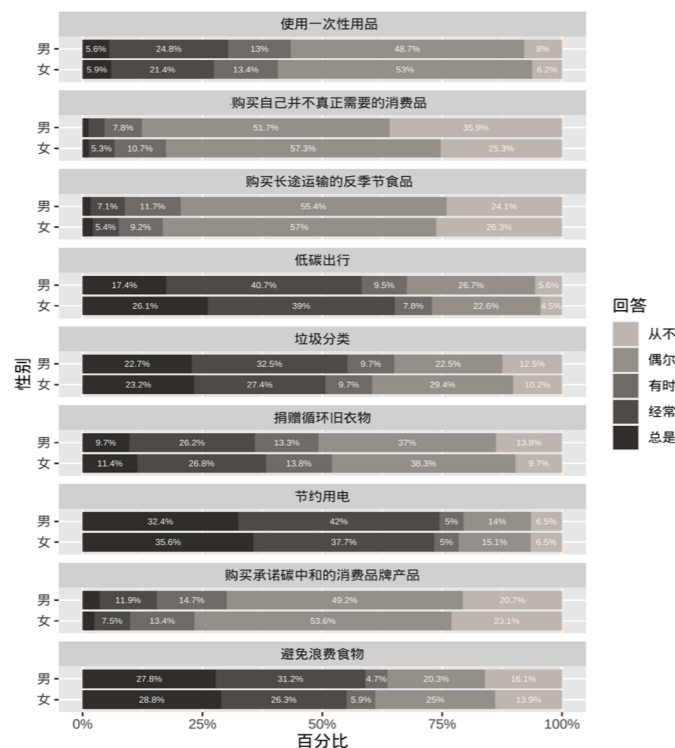


图4-13 男女受访者的个人环保生活方式行为实践程度

■ 一次性物品在生产和废弃处理环节相比于可重复使用的物品会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频率是气候友好行动的体现。如图4-13所示，在是否使用一次性用品的问题上，男性与女性的行为模式基本相似：约13%男性和女性受访者表示“有时”使用一次性用品。约一半的男性（48.7%）表示“偶尔”使用一次性用品，女性中超过一半（53.0%）表示“偶尔”使用。女性和男性受访者约5%表示“总是”使用一次性物品，另有超过五分之一女性（21.4%）表示“经常”使用一次性用品，略低于男性-24.8%男性受访者表示“经常”使用。综上，女性总体一次性物品使用频率低于男性，表现略佳。但“从不”使用一次性用品的女性比例为6.2%，略低于男性的8.0%。

■ 购买非必要的消费品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因消费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会增加碳排放，因此减少购买非必要消费品的频率是气候友好行动的表现。在不购买非必要消费品的问题上，男性展现出更佳实践频率，通过卡方检测有统计学上显著差异。如图4-13所示，超过三分之一（35.9%）男性表示“从不”购买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而仅四分之一（25.3%）女性“从不”购买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超过一半的女性（57.3%）表示“偶尔”购买不真正需要的商品，另有10.7%表示“有时”这样做。相较之下，男性中“偶尔”购买非必要商品的比例为51.7%，7.8%表示“有时”这样做，略低于女性。表示“经常”和“总是”购买非必需品的男性比例也低于女性。这反映出女性更频繁购买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需要加强消费中的环境意识或节制倾向。

■ 减少购买长距离运输、反季节食品的频率是气候友好的行动，因为运输和生产储存这些食品的碳排放量要高于运输里程短、当季的食物。在购买长距离运输、反季节食品的频率上，女性表现略佳，通过卡方检测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如图4-13所示，男性中“总是”、“经常”（7.1%）、“有时”（11.7%）购买该类食品的比例略高于女性（5.4%、9.2%）。超过一半的女性（57.0%）表示“偶尔”购买这类食品，略高于男性（55.4%）。此外，女性中有超过四分之一（26.3%）表示“从不”购买长距离、反季食品，略高于男性的24.1%。整体来看，女性在此项气候友好行为上略微表现出更高的日常实践频率。

■ 在低碳出行方面，如图4-13所示，男性中有超过四成（40.7%）表示“从不”采取低碳出行方式，如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而女性中这一比例为39.0%。女性在中

度频率上的表现更加突出，有超过四分之一（26.1%）表示“有时”选择低碳出行，明显高于男性的17.4%。虽然“经常”采用低碳出行方式的比例在两性中都不高，但女性的整体出行行为更偏向频率适中、日常整合性较高。

■ 垃圾分类行为上，男性践行频率略高，通过卡方检测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如图4-13所示，近四分之一的男性（22.7%）表示“总是”进行垃圾分类，约三分之一表示“经常”垃圾分类（32.5%）。女性中23.3%“总是”进行垃圾分类，27.4%表示“经常”垃圾分类，总体略低于男性。而在“有时”进行分类的选项上，男女受访者频率一致（9.7%）。更高比例女性表示“偶尔”垃圾分类（29.4%，男性为22.5%）。有近一成男性（12.5%）和女性（10.2%）受访者“从不”垃圾分类也大致持平，说明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环保行为在整体社会中尚未形成稳定的高频实践，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波动。

■ 捐赠和循环旧衣服是一个气候友好行为，因为它可以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减少生产新衣服的资源消耗和纺织废弃物，从而降低碳排放。在是否捐赠或循环使用旧衣物的问题上，男女行为分布非常接近。如图4-13所示，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偶尔”捐赠旧衣物，男性为37.0%，女性为38.3%。约十分之一受访者“总是”进行此项行为，女性为11.4%，男性为9.7%。超过四分之一女性（26.8%）和男性（26.2%）受访者“经常”捐赠、循环旧衣物，13.8%女性受访者和13.3%男性受访者表示“有时”捐赠循环旧衣服。这说明捐赠、循环旧衣物在中国公众有一定实践度，但高频实践者中的比例依然偏低，相较低碳出行、节约用电、避免食物浪费等气候友好行为仍需普及。

■ 发电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因此节约用电是日常可行的气候友好行动。节约用电在男女中均普及程度较高，是被最高频实践的行为之一。如图4-13所示，女性有超过三分之一（35.6%）表示“总是”节约用电，男性中有32.4%，是所有行为中最高的一项。女性有37.7%表示“经常”节约用电，略低于男性42.0%。5%的女性和男性受访者表示“有时”节约用电，15.1%女性和14%男性受访者表示“偶尔”节约用电，仅6.5%男性和女性受访者“从不”不节约用电。综合来看，节能用电已成为较为广泛认同和践行的环保行为之一，男女之间的差异不大。

■ 避免食物浪费是重要的气候友好行动，因为食物从生产、运输到处理的全过程都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减

少浪费不仅节省资源，还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在减少食物浪费的行为上，男女受访者实践频率均较高，女性的高频实践比例略低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如图4-13所示，大约三成的女性（28.8%）和男性（27.8%）表示“总是”避免浪费食物，26.3%女性表示经常避免食物浪费，男性为31.2%，高于女性五个百分点。4.7%男性和5.9%女性表示“有时”避免食物浪费。五分之一男性“偶尔”避免食物浪费（20.3%），四分之一女性“偶尔”避免食物浪费（25%）。

■ 购买承诺碳中和的消费品牌产品是消费者以市场行为向企业施压、推动绿色供应链和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行动。这是衡量公众碳中和消费行为的直接指标，体现了“用钱包投票”的理念。在选择碳中和品牌产品上，男性表现出更高比例的高实践频率，且通过卡方检测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如图4-13所示，11.9%和14.7%男性表示“经常”或“有时”购买碳中和品牌产品，显著高于女性（7.5%和13.4%女性受访者表示“经常”或“有时”购买）。“总是”购买碳中和品牌产品的男女受访者比例均低于4%，但男性略高一点。而超过一半女性（53.6%）表示“偶尔”购买此类产品，男性中“偶尔”选择碳中和品牌的比例为49.2%。女性中“从不”购买的比例（23.1%）略高于男性”（20.7%），反映出女性在通过消费行为助力碳中和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 进一步从社会人口特征上对比，农村和城市男性购买承诺碳中和的产品频率均高于各自区域的女性，在城市中差距更大。如图4-14所示，近四分之一（23%）城市女性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的产品，低于城市男性七个百分点（30.2%）。农村女性的实践频率则与城市女性近似（23.8%），但低于农村男性六个百分点（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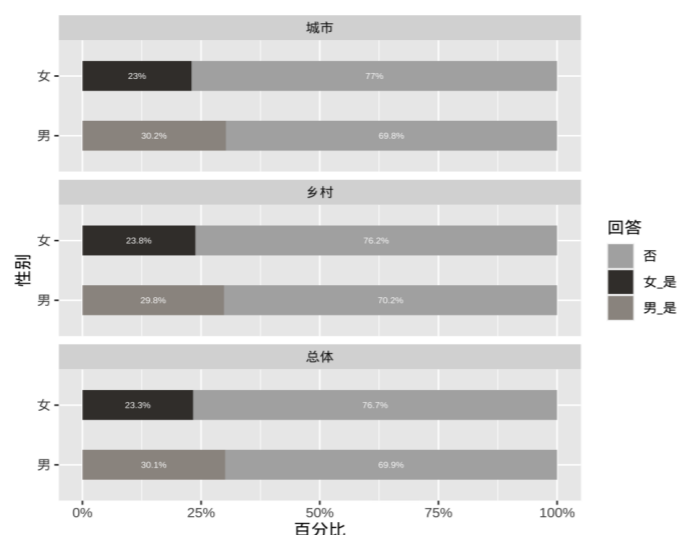


图4-14 城乡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的对比

■ 如图4-15所示，女性中购买承诺碳中和的产品频率与教育水平的变化关系不明显，男性购买频率在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中最高（31.4%），而该学历女性购买频率为23.1%。高中学历女性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的比例最高，约四分之一（25.7%），与同等学历男性类似（27.4%）。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男性购买频率第二高，28.4%，高于同学历女性（21.3%）。

■ 如图4-16所示，各年龄段女性至少有时购买碳中和产品的比例相似，均在23%左右，老年比例最高23.8%，中年其次23.2%。男性中高频购买比例随年龄上升而升高，老年男性受访者有37.6%至少“有时”购买碳中和产品，在所有群体中最高，中年男性其次（29.3%），青年男性最低（27.6%）但仍高于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受访者。

■ 如图4-17所示，中等收入女性高频购买比例在女性群体中最高，超四分之一（26.6%）；较高收入女性紧随其后（26%）；较低收入女性约两成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22.1%）。男性中高频购买比例随收入水平升高而升高：较高收入男性近三分之一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的产品（32.6%）。中等收入男性紧随其后（31.2%），较低收入男性再次（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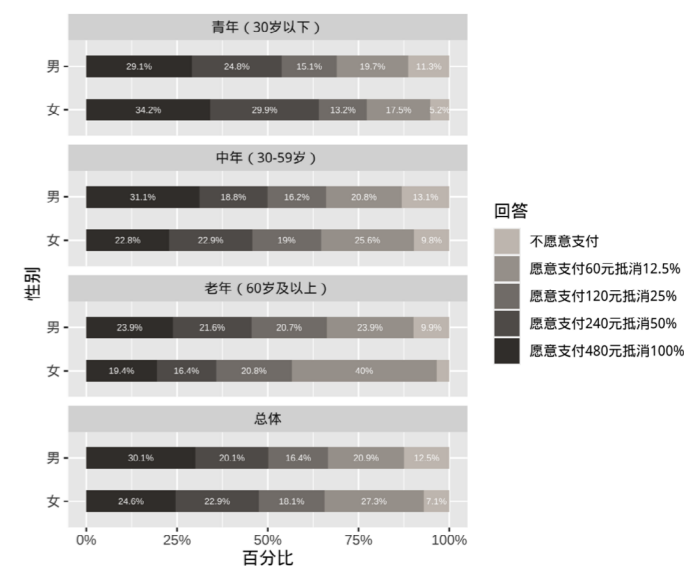


图4-15 不同教育水平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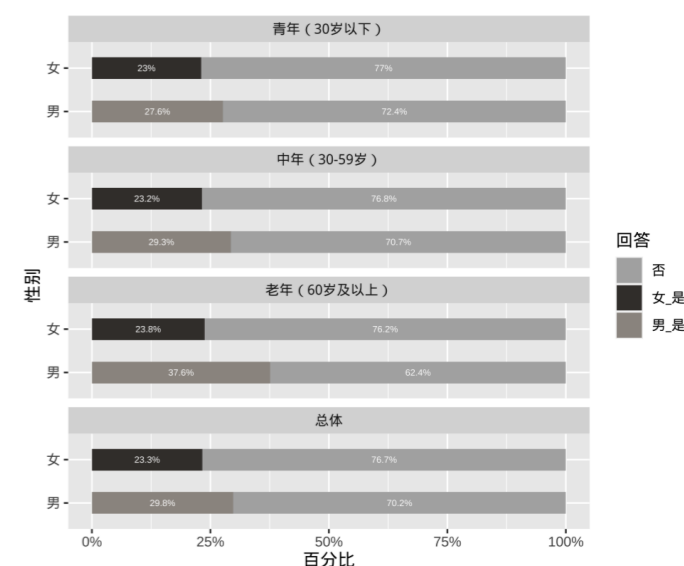


图4-16 不同年龄段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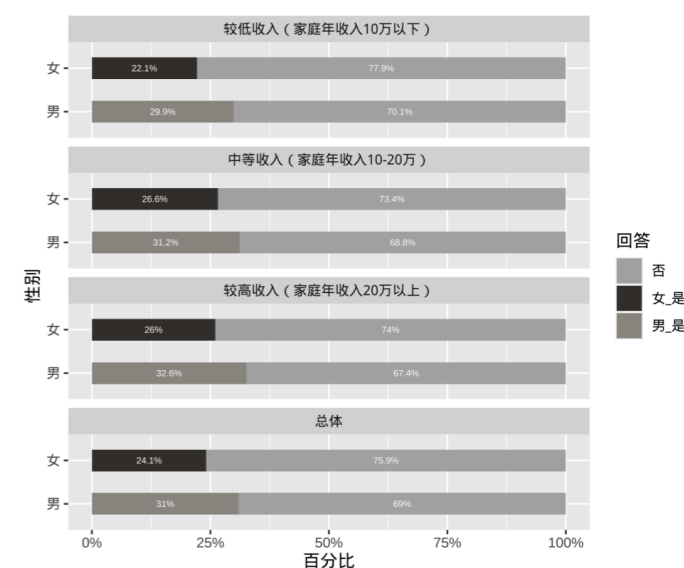


图4-17 不同收入水平段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的对比

从不同职业来看，男女学生和政府/国企/公务员是高频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比例最高的群体。如图4-18所示，31.1%男性学生和30.5%女性学生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37.4%男性政府相关从业人员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在所有群体中最高，大幅高于女性同职业受访者（24.1%）。男性商业/职业技术人员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比例也较高29.5%。除学生外，女性其他职业受访者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的比例均在二成左右：女性农民（23%），退休/待业（22.5%），自由职业者（21.9%），商业/职业技术人员（20.9%）。

综上所述，女性对低碳出行、捐赠循环利用旧衣物、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购买反季节长途运输食品实践程度更高；男性对购买碳中和商品、不购买非必需消费品、垃圾分类程度更高。节约用电、避免食物浪费等行为已较为普及，成为多数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这一分类有助于揭示哪些行为是性别实践分化的热点领域，也为未来在不同行为领域推动公众气候行动提供了策略方向。

四、男女受访者在公众领域气候友好行动上的差异

在公众领域的气候友好行动上，女性践行程度得分略低于男性，但男女差距不大。男女整体对公众领域的气候友好行动实践程度不如个人行动。如图4-19所示，依据1-5的打分（5分为最高频率实践），整体实践度最高的是鼓励他人做气候友好行为（女性受访者平均3分，男性受访者平均2.99分，即“有时”践行）。其次是做专业相关的低碳活动，女性受访者平均2.59分，男性受访者平均2.67分，介于“有时”和“偶尔”践行之间。紧随其后是向他人介绍低碳生活的知识，女性受访者平均2.46分，男性受访者平均2.49分，通过卡方检测男女实践度有显著差异，总体仍介于“有时”和“偶尔”践行之间。其他公众领域的行动，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女性平均分2.22，男性平均分2.27）、参加政府或民间组织举办的低碳活动（女性平均分2.07，男性平均分2.19）、和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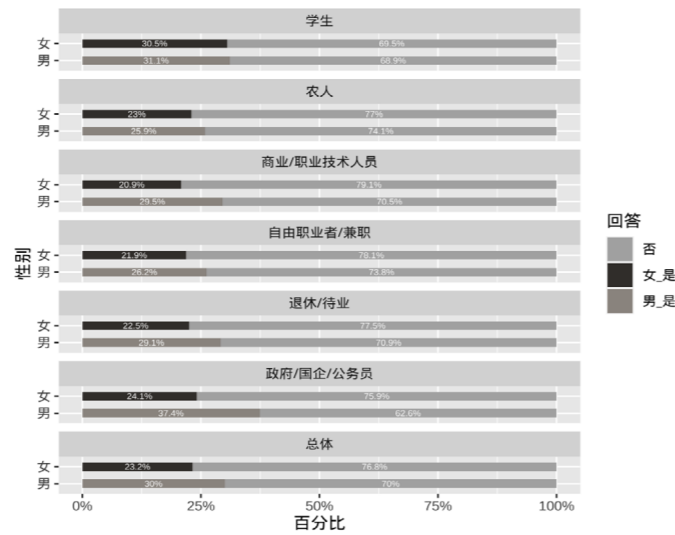


图4-18 不同职业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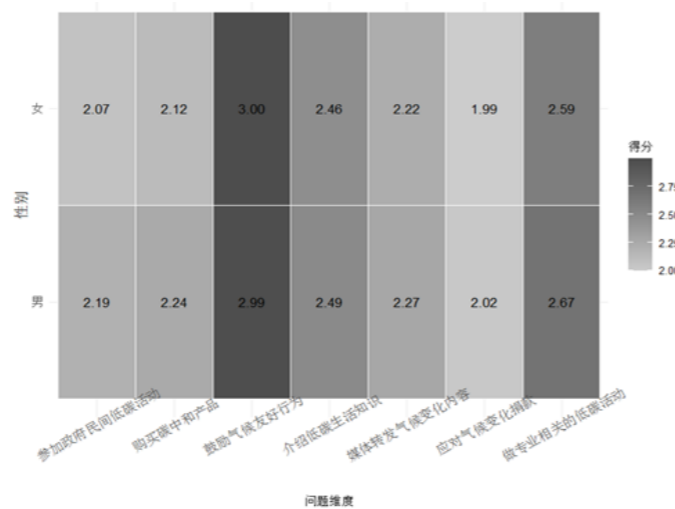


图4-19 男女受访者的公共领域气候友好行动实践程度

关活动捐款（女性平均分1.99，男性平均分2.02），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平均分均在2左右，即“偶尔”践行。这说明中国公众对参与公共领域的气候友好行动还较为陌生，男性受访者的践行程度略微高于女性。通过卡方检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和参加政府或民间组织举办的低碳活动两项上，男女实践度有显著差异。中国女性在面向他人和公共领域的行动潜力尤需挖掘。

从不同的社会人口维度来看，如图4-20所示，农村的中老年男性（46-60岁，61岁+）在所有组别中整体最高比例参与各项面向公众的低碳活动，城市青年的男性和女性受访者（46-60岁）实践程度也较高，农村和城市中青年31-45岁男女受访者随后。鼓励气候友好行动是男女各年龄段中实践度都较高的公众领域气候行动，向他人介绍低碳生活、做专业相关的低碳活动其次。

从收入水平上看，各收入水平男性较女性更高比例参与政府或民间组织举办低碳活动。如图4-21所示，中等收入中男女的实践比例差距最大（30.8%男性，23.6%女性），较高收入群体中男女实践度近似（27.6%男性，26.3%女性），较低收入中男性略高（31.9%男性，28%女性）。较低收入女性行动度最高，较高收入其次；男性中，较低收入受访者行动度最高，中等收入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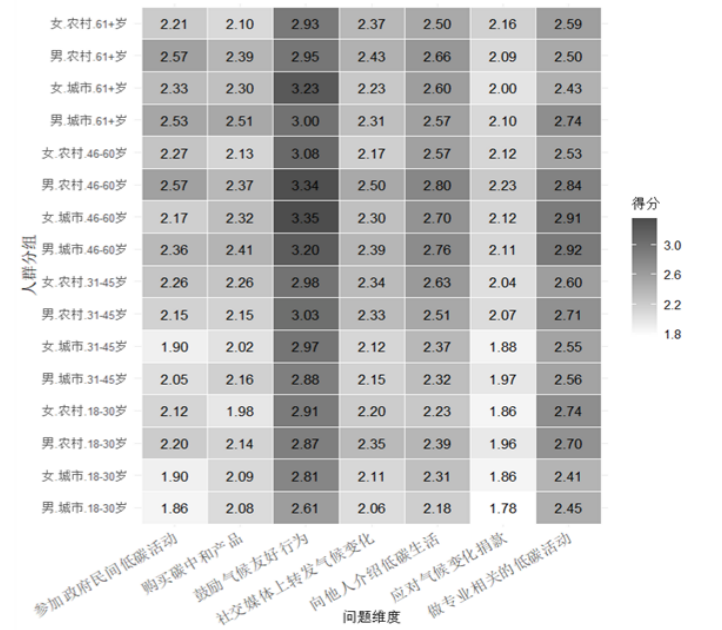


图4-20 城乡不同年龄段男女受访者的公共领域气候友好行动实践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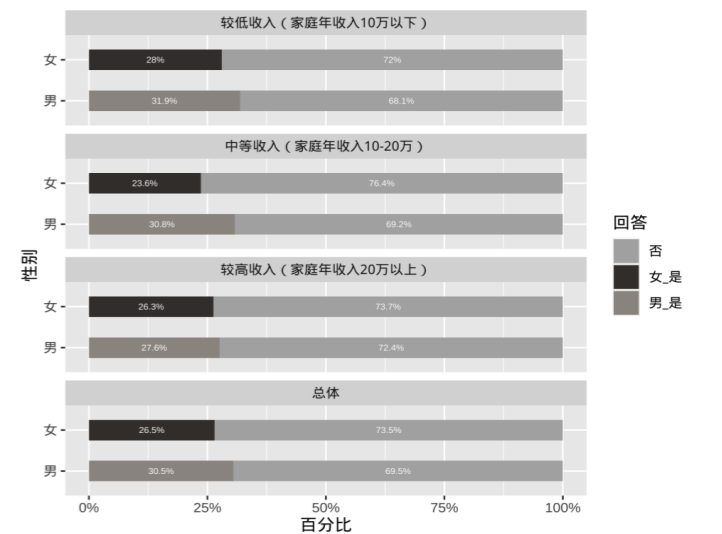


图4-21 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参加政府或民间组织举办低碳活动的对比

图4-22展示了不同性别与学历群体是否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气候变化信息的情况。整体来看，无论性别如何，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没有转发过相关信息，约七成未参与此类线上表达。女性中有转发行为的比例为27.8%，略低于男性的32.3%。从学历维度看，各教育水平男性至少“有时”转发的比例都高于女性。在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中，男性为33.2%，女性为31%；高中及同等学历群体中，男性为30.4%，女性为29.5%；在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中，差距最为明显，男性为32.9%，女性仅为25.8%。这表明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参与气候传播的积极性普遍低于男性，尤其在高学历群体中差距更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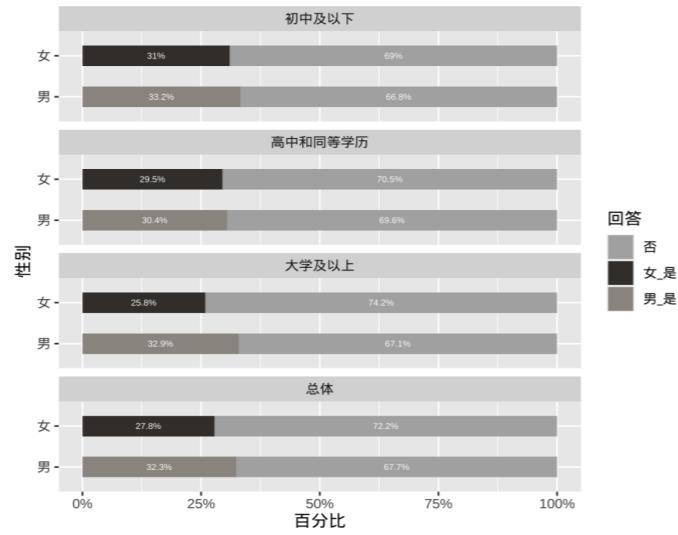


图4-22 不同教育水平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在社交媒体转发气候变化信息的对比

图4-23展示了不同职业群体中，男女受访者是否至少“有时”在自身专业领域参与过低碳活动的情况。总体来看，男性参与的比例为47.6%，高于女性的42.6%。各职业群体来看，男性在大多数职业类型中参与率均高于女性。在政府/国企/公务员中，男性为61.6%，参与度在所有群体中最高，远高于女性48.2%；在学生群体中男女差异较小，男性为45.6%，女性为42.9%；在商业/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为45.1%，女性为42.1%；在自由职业者/兼职中，男性为44.4%，女性为42.9%；退休/待业群体中，男性为42%，女性为36.8%。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群体中，女性的参与比例（48%）显著高于男性（44.7%），是唯一一个女性高于男性的职业类型。这说明农村女性在低碳活动参与和气候行动领导力上的潜力。总体来看，不同性别在专业领域的低碳参与行为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可结合职业特性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行动引导策略，提升各类人群特别是女性在专业领域的低碳实践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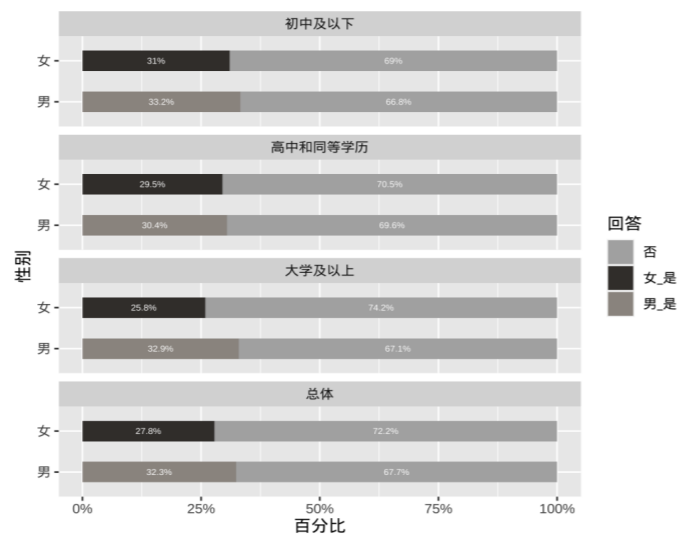


图4-23 不同职业男女受访者至少“有时”做专业领域相关的低碳活动对比

五、男女受访者对低碳生活的阻碍认知差异

根据图4-24所示，男女受访者认为不知道在哪里购买低碳产品和无法识别低碳产品是比较大的障碍，女性更倾向于认知到实施低碳生活可能面临的各种阻碍。其中，通过卡方检测，女性在“低碳产品的价格比类似的普通产品更高”、“不知道哪些产品是低碳”、“不知道在哪里购买低碳产品”、“我周围很少有人采纳低碳生活方式”四项阻碍上认同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受访者。

“低碳产品的价格比类似的普通产品更高”被认为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其中三分之一女性（33.1%）认为价格偏高是阻碍，高于男性的29.4%。这说明女性在采纳低碳生活方式时对成本更为敏感。在“我不知道哪些产品是低碳的”这一项上，女性中有40.3%表示是低碳生活的阻碍，男性则为31.7%，差异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女性在低碳产品识别方面感受到更大的困难，反映出当前低碳产品缺乏明确标签和传播渠道的问题。农村女性最高比例认为“不知道哪些是低碳产品”是障碍。“我不知道在哪里买低碳产品”的问题也被较多提及，尤其是女性中有44.3%表示不清楚，高于男性的33.5%。农村女性最高比例认为不知道在哪里购买是障碍。“我周围很少有人采纳低碳生活方式”也被部分人视为阻碍因素。28.3%的女性选择了这一项，高于男性的22.6%。这提示女性可能更关注社会氛围和他人行为，若缺乏身边人的榜样力量，可能影响其参与低碳行为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还有几项因素虽未显示出显著性别差异，但也反映出公众对低碳生活的顾虑。例如，“低碳产品的质量不如类似的普通产品”获得认同的比例在一成左右（男性13%、女性12.4%），说明低碳产品的质量问题是公众主要担心因素；“低碳生活方式会很不方便”有17.8%的男性和19.2%的女性表示认同；而“低碳生活方式对气候变化没有影响”的认同者更少，仅有约一成，显示公众基本认可个人低碳行为对气候的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女性在多个维度上对低碳生活的障碍感知更为明显，特别是在获取信息、社会氛围感知以及经济负担等方面。这些差异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主体，在推动低碳转型过程中，应更加关注女性面临的认知和结构性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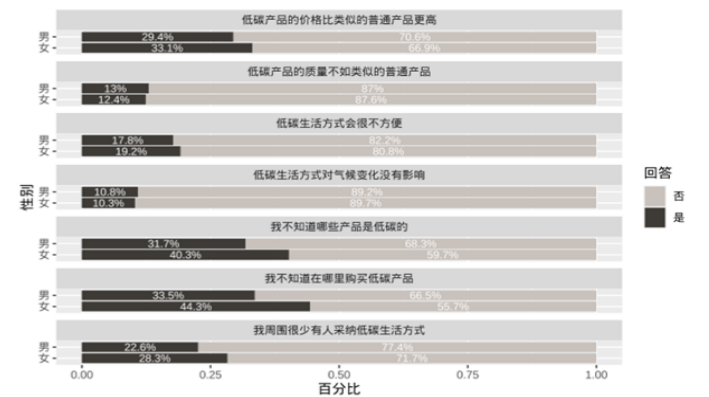


图4-24 男女受访者对低碳生活的各项阻碍认同度对比

以下从不同社会人口特征进一步分析低碳生活的阻碍因素。图4-25展示了不同收入水平下，男女受访者对“低碳产品价格比类似普通产品更高”的认知比例。在女性群体中，价格是阻碍的认同度随收入水平升高而下降，较低收入家庭女性最认同这一阻碍（35.5%）。但在男性群体中，价格是阻碍的认同度反而随收入水平升高而升高：较高收入男性群体（33.9%认同）并未因其更强的经济实力而减弱对低碳产品价格的敏感度。较低收入男性反而少于三成认为低碳产品价格更高是阻碍（26.5%）。整体来看，女性对价格阻碍的认知普遍高于男性，尤其在中低收入群体中差异更为明显。在较低收入群体中，35.5%的女性认为低碳产品价格更高，高出男性近9个百分点（男性为26.5%）。中等收入群体中，女性认同该观点的比例为33.2%，同样高于男性的28.8%。在较高收入群体中，两性之间差异最小，女性为32.4%，男性为33.9%，几乎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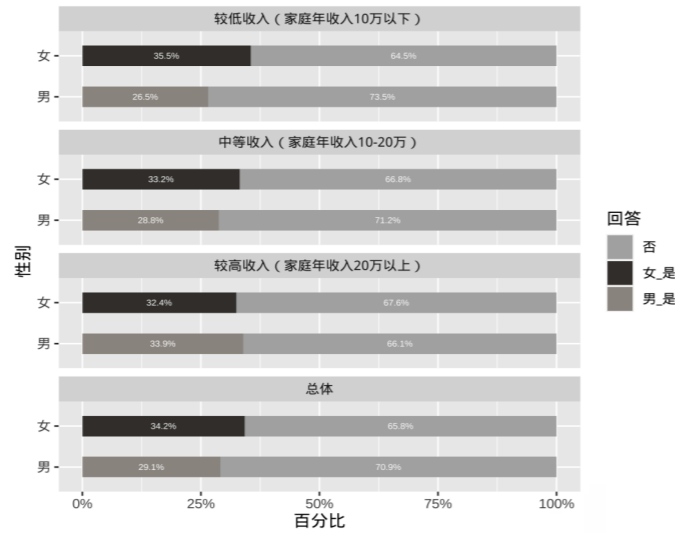


图4-25 不同收入水平男女受访者对低碳产品价格比类似普通产品更高的认同度

图4-26显示了不同教育水平的男女受访者对“不知道哪些产品是低碳”是低碳生活阻碍的认同度。女性中，对识别低碳产品困难这一阻碍的认同度随教育水平升高而下降，大学以上学历女性最少认为这是低碳生活阻碍（37.2%），低于初中及以下学历女性十个百分点（47%）。男性中，对这一阻碍的认同度随学历水平变化并不明显，均在三成左右：大学及以上学历31%，初中及以下32.6%，高中同等学历33.2%。这说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对消除识别低碳产品这一阻碍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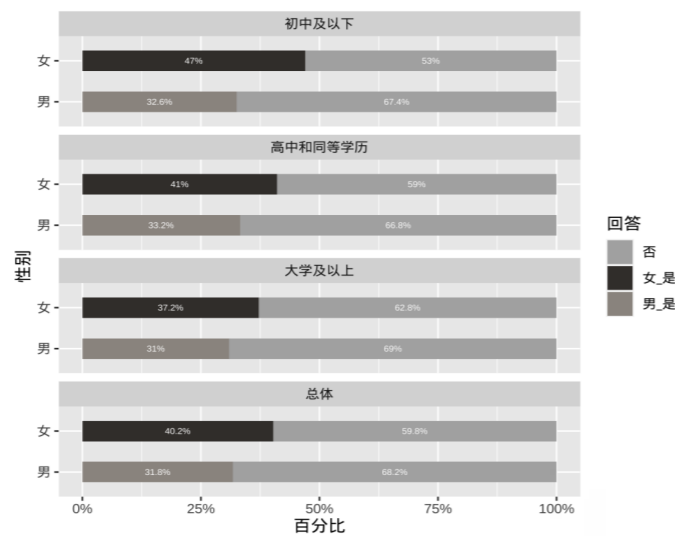


图4-26 不同教育水平男女受访者对不知道哪些产品是低碳的认同度

图4-27显示不同职业男女受访者对“不知道哪些产品是低碳的”这一低碳生活阻碍的认同度。女性中，学生（32.2%）、自由职业者（34.9%）不太认为识别低碳产品是阻碍，但农民（47.5%）、退休/待业人员（44.4%）认为别低碳产品阻碍大，商业/专业技术人员（40.3%）、和政府/国企/公务员（39.6%）随后。农民、退休/待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女性对这一阻碍的认同度比男性的认同度差异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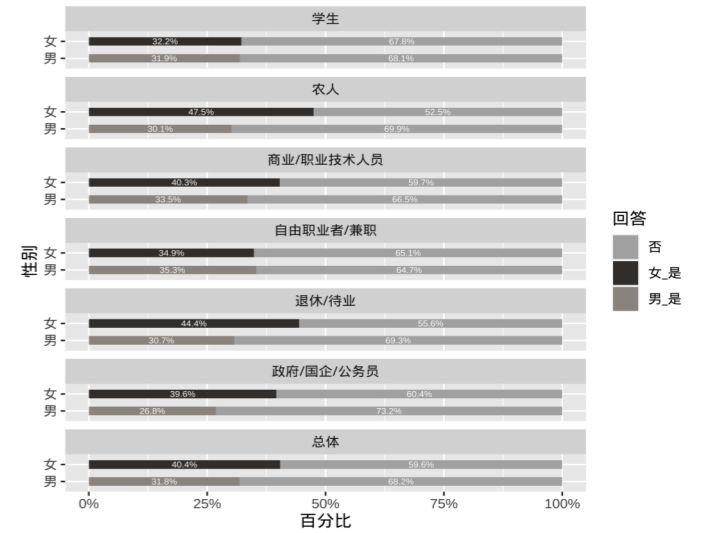


图4-27 不同职业男女受访者对不知道哪些产品是低碳的认同度

图4-28显示了城乡男女受访者对“不知道在那里购买低碳产品”是低碳生活阻碍的认同度。农村女性对这一障碍的感知最强（44.8%），城市女性感知度类似（44%）。农村男性感知最弱（30.1%），城市男性感知（35.2%）较城市女性更强，农村中男女差异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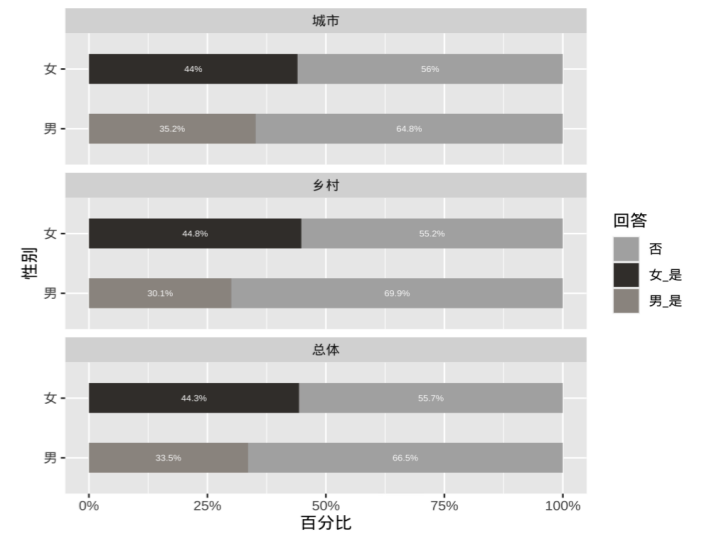


图4-28 城乡男女受访者对不知道在那里购买低碳产品的认同度

图4-29展现不同年龄段男女受访者对“周围很少人有人采纳低碳生活方式”是低碳生活阻碍的认同度。老年女性对这一阻碍的认同度最高（37%），青年女性其次（33.7%），中年女性低于前两者超过十个百分点（22.1%）。说明在女性群体中，低碳生活的社会认同感和从众氛围对其行为影响显著，尤其是对老年人和青年人而言，周围人的采纳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们对低碳行为的可行性判断。男性中这一趋势相反：老年男性对“周围很少人有人采纳低碳生活方式”是低碳生活阻碍的认同度最低（18%），中年男性其次（21.8%），青年男性最高（28.1%）。整体上，中年群体对他人低碳行为的依赖程度较低，这种独立性有利于培养该群体成为低碳行为的领导者；而青年群体受周围人是否采纳低碳生活方式影响较大，可调动朋辈影响促进低碳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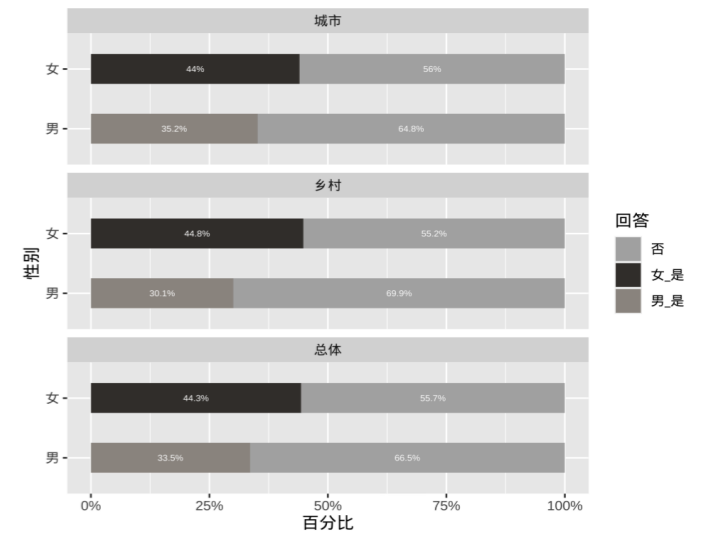


图4-29 不同年龄段男女受访者对周围很少人有人采纳低碳生活方式的认同度

05

中国女性 对气候传播 渠道与内容的 效果评价

小结

- 超八成男性和女性受访者愿意为气候友好的产品多花钱。在支付环保产品溢价和碳抵消方面，女性整体支付意愿更高，但男性愿意支付高额溢价比例更高。
- 女性愿意支付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比例高于愿意支付溢价购买气候友好产品的比例。其中，超四分之一女性（27.5%）愿意花60元抵消八分之一个人出行产生的碳排放量，是女性受访者中支付愿意比例最高的一个价格水平。
- 男性更高比例实践垃圾分类、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不购买不需要的物品等行为，女性则更常低碳出行、捐赠旧衣、不购买长途运输和反季节食品等行为。公众整体对绿色出行、节约用电、避免食物浪费等行为实践度高，不是用一次性用品、购买碳中和产品实践度待加强。
- 男性各群体更积极参与公众气候行动，女性参与面向他人的、公众领域的气候行动频率可提升。农村的中老年男性（46-60岁，61岁+）在所有组别中整体最高比例参与各项面向公众的低碳活动，城市青年的男性和女性受访者（46-60岁）实践程度也较高。
- 男女受访者认为不知道在哪里购买低碳产品和无法识别低碳产品是比较大的障碍，女性对各项低碳生活的障碍认同度高于男性。女性在“低碳产品价格更高”（33%）、“不知道哪些产品是低碳”（40%）、“不知道在哪里购买低碳产品”（44%）、“我周围很少有人采纳低碳生活方式”（28%）四项阻碍上认同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受访者。

我们从听说气候变化的频率、渠道、受访者关注的新闻内容、对气候变化信息进一步了解的意愿、和信任的信息源五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女性接受气候变化信息的现状，对气候变化传播途径和策略提供参考建议。

整体来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高频听说气候变化的比例低于男性，但都有较强意愿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如气候变化的成因、政策、与日常生活的联系等。女性受访者相较男性更多从家人朋友、社交媒体、视频平台接受信息，且对于官方权威性信息源（政府、科研机构）、社会组织、还有个人生活网络中的信息源（家人、社交媒体、朋友）有较佳的信任度。不同性别受访者对关注的新闻内容、信任的信息源、和愿意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的议题维度回答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为针对不同群体的气候变化传播策略提供了参考。

一、女性更低比例经常在生活中听说气候变化

■ 女性整体上接触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频率略低于男性。如图5-1所示，这张图显示了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气候变化话题的频率分布情况。整体来看，超过六成受访者表示自己每月至少听到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话题，男性为60.0%（每月至少一次 36.1%+每周至少一次 23.8%），女性略高，为63.4%（每月至少一次 29.5%+每周至少一次 32.2%）。在“每年多次”这一中等频率的选项中，女性占比为32.2%，略高于男性的25.5%。而在“几乎听不到”的“从不”项中，两性差异不大，男性为4.2%，女性为4.6%。可以看出，在中等频率和较高频率的回答中占比更大，反映出女性可能更容易从日常渠道中接触到气候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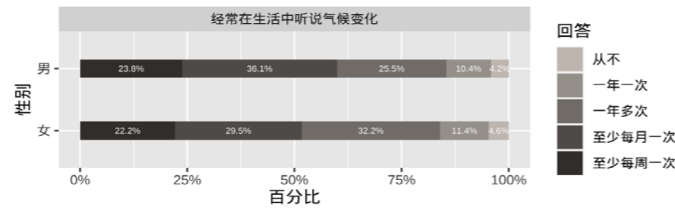


图5-1 男女受访者在生活中听说气候变化的频率

二、气候变化信息接受途径男女差异

■ 图5-2显示，男性和女性在不同信息渠道中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频率呈现出一定差异。在传统媒体渠道方面，女性经常（每月一次或更多）通过电视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比例为58.5%，略高于男性的57.4%。每月一次或更多通过报纸接触气候变化信息的男性受访者比例为29.7%，高于女性的24.5%，通过卡方测试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广播渠道中，男性和女性的接触比例接近，分别为24.8%和22.9%。杂志作为高频气候变化信息接受渠道的比例整体较低，男性为18.2%，女性为17.7%。

在数字媒体渠道方面，每月一次或更多通过新闻软件获得气候变化信息的男性比例为48.6%，略高于女性的45.7%。每月一次或更多通过电脑网页获得气候变化信息的男性比例达到37%，高于女性的33.8%，通过卡方测试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社交媒体渠道上，女性高频接触气候变化信息的比例为48.3%，略高于男性的47.3%。从视频平台每月一次或更多获得气候变化信息，女性比例为47.2%，略高于男性的46%。

综合分析表明，女性更倾向于通过人际传播、电视及数字媒体获取气候变化信息，且高频接触的比例普遍高于男性。男性则在报纸、电脑网页等渠道表现更为活跃，但高频接触者比例多低于女性。男女在传统媒体和部分数字渠道的差异较为明显，而在社交媒体、视频平台等新兴渠道的差异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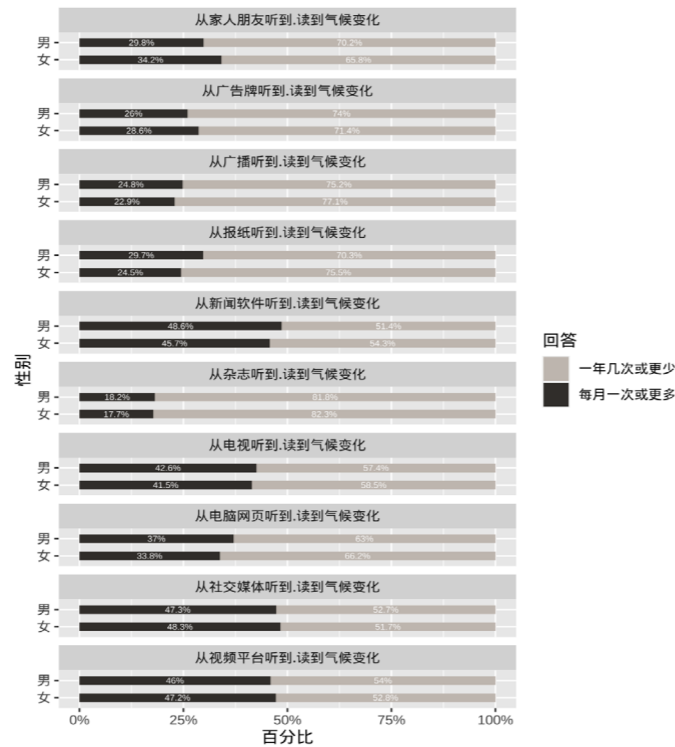


图5-2 男女受访者从不同信息渠道听到/读到气候变化频率对比

三、男女关注新闻类型差异显著

■ 根据卡方检测，男性和女性在关注的新闻类型上有显著差异，显著性适用于各个新闻类型。这种差异也揭示了气候变化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性别路径分化。如图5-3所示，女性更关注社会、娱乐、环境类新闻。在“最关注社会新闻”方面，57.8%的女性表示关注，明显高于男性的43.8%。在“最关注娱乐新闻”方面，女性关注度达到39.6%，而男性仅为15.8%，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在环境新闻的关注上，女性略高，但男女差异不大：38.1%的女性和35.7%的男性表示最关注环境类新闻。这显示出女性更倾向于关注人文、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内容。

男性则更高比例关注政治、科技、体育和经济类新闻。在“最关注政治新闻”中，52.8%的男性表示关注，高于女性的41.5%。科技新闻方面，男性的关注度为36.6%，也显著高于女性的23.3%。在体育新闻上，性别差异尤为突出，24.2%的男性表示体育是他们最关注的新闻类型，而女性仅为17.3%。在经济新闻中，不同性别的关注度差距较小，男性关注度为39.2%，略高于女性的35.2%。

总体来看，不同性别对于社会和政治类新闻关注度最高，女性对前者关注更高，男性对后者关注更高。公众总体对经济类和环境类新闻的关注度其次，男性和女性关注度差别不大，男性对前者关注略高，女性对后者关注略高。信息接收偏好的性别差异提示我们，在气候传播策略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不同性别群体获取信息的媒介路径和内容偏好。例如，针对女性受众，可以强化气候变化与日常社会关系、社区影响、弱势群体等社会维度的联系，提升情感共鸣与公共参与感；而针对男性受众，则可以强调气候政策、治理措施、国家承诺等政治维度，从宏观角度强化其责任意识和理性关注。女性已经有对环境新闻关注的一定基础，且在经济和环境类新闻两个领域可以作为通用的信息渠道向广泛公众进行主流传播。例如，可通过能源转型、绿色产业、碳市场、气候风险等经济视角，或通过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极端天气事件等环境视角，传达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现实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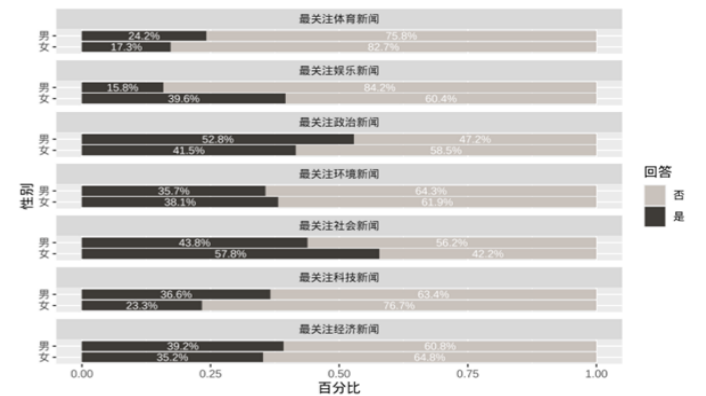


图5-3 男女受访者最关注的新闻类型对比

四、男女受访者均愿意更多了解气候变化相关信息

■ 如图5-4所示，超过九成男女受访者希望更多了解气候变化的信息（男性91.5%，女性91.3%），显示出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这一议题认知加深的强烈意愿，为推动公众气候变化行动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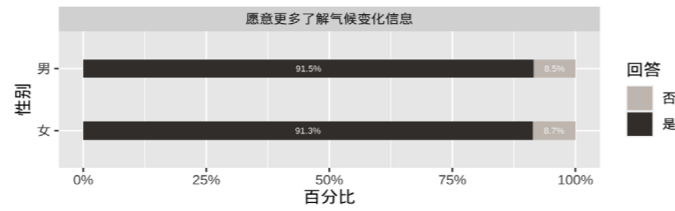


图5-4 男女受访者更多了解气候变化信息的意愿

■ 从愿意了解的气候变化议题来看，男女呈现出差异，女性对各个议题想了解至少“多一些”的比例总体略低于男性。女性受访者对气候变化的成因、政策、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表现出较高比例愿意多了解的意愿。如图5-5所示，在了解气候变化的成因方面，男女受访者意愿较高均超过七成：数据显示女性愿意了解“多很多”的比例为6.7%，男性为8%，在“多一些”的比例上，男性为25.8%，高于女性的23.5%；在多一点的比例上，男性为38.5%，女性为40.9%。卡方检验表明这一维度的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类似地，在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男性超过三分之二愿意了解“多很多”、“多一些”、“多一点”的总和上高于女性（男性8.1%+24.3%+36.1%，女性7.1%+21.3%+35.3%）通过卡方检验男女的意愿回答有显著性差异。

对于气候变化的应对方案，超过六成男性（67.9%）和女性（62.4%）愿意至少了解多一点，男性高于女性五个百分点，且男女的意愿回答有显著性差异。超过七成男性（71.1%）愿意至少多了解一点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行动，高于女性（65%），且男女的意愿回答有显著性差异。

相比之下，在了解气候变化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以及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性别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近七成女性（68.5%）和男性（68.7%）受访者愿意至少多了解一点气候变化的政策，意愿较积极，而62.4%女性和67.9%男性受访者愿意至少多了解一些气候变化的应对方案。整体而言，女性在更多了解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方面的意愿较多处在“多一点”和“多一些”的层级，对气候变化成因、与日常生活联系、政策的信息接受意愿稍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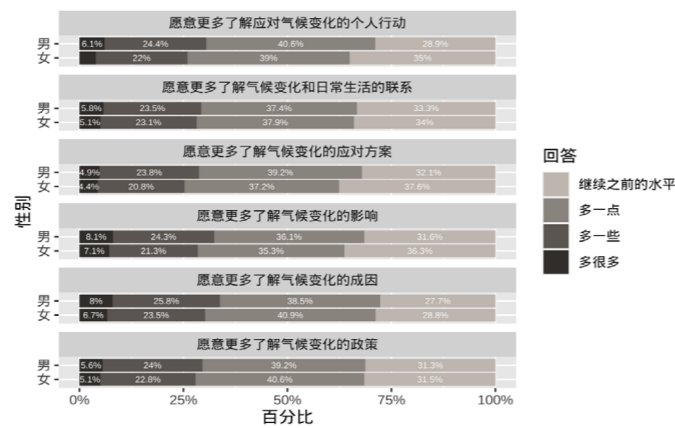


图5-5 男女受访者更多了解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意愿对比

五、女性对各个信息源信任度更高，男女回答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 受访者对不同信息源的信任程度为如何进一步传播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提供了宝贵参考。如图5-6所示，女性和男性受访者对于中央政府、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家人信任度最高。近乎所有受访者对于中央政府作为气候变化的信息源都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对科研机构的信任度也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女性95.9%，男性93.5%）。女性受访者对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家人作为气候变化信息源的“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比例均超过90%，略高于男性受访者。新闻媒体（女性92.1%，男性89.4%）和朋友（女性86.4%，男性81.4%）作为气候变化信息源的被信任度其次，企业（女性67.3%，男性57.4%）和互联网（女性70.8%，男性63.7%）最低。男性整体呈现出各个信息源较低信任度，不同性别群体对信息源的信任度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政府+科研机构的权威性传播在气候变化信息中具有极强的公信力，可作为核心信息渠道。社会网络（家人、朋友、社交媒体）可作为辅助传播渠道，在女性中信任度也相当高。公众，尤其男性，较谨慎处理企业和互联网等渠道的气候变化信息传播方式，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或增加官方背书来改善其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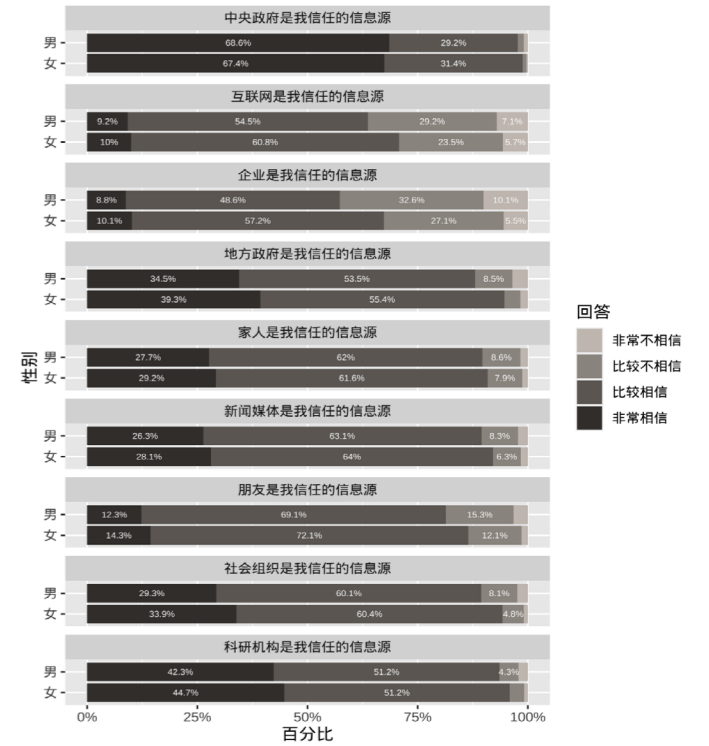


图5-6 男女受访者对不同信息源的信任程度对比

小结

- 女性受访者整体更低比例表示在生活中经常听说气候变化。
- 在接受气候变化的信息途径上男女差异显著。女性更倾向于通过人际传播、电视及数字媒体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男性则在报纸、电脑网页等渠道表现更为活跃。
- 在环境新闻的关注上，女性略高。女性更高比例最关注社会、娱乐新闻，男性则更高比例关注政治、科技、体育和经济类新闻，可以将气候变化信息与不同领域新闻融合、针对性传播。
- 超六成男性和女性受访者表示愿意更多了解气候变化的成因、政策、和应对行动。女性对气候变化成因、与日常生活联系、政策的信息接受意愿稍强，中年女性和中高收入女性对更多获取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意愿尤为高。
- 女性对各个信息源信任度普遍高于男性，所有受访者对于中央政府、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家人信任度最高。这表明政府+科研机构的权威性传播在气候变化信息中可作为核心信息渠道，社会网络（家人、朋友、社交媒体）可作为辅助传播渠道，在女性中信任度也相当高，尤其乡村女性。

06

中国女性 气候认知与行动 潜力分析

通过前面梳理，可以看出女性和男性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存在差异。本部分将在总结前五部分主要发现的基础上，从性别与城乡、年龄、职业、收入、教育水平五个维度挖掘“多维交叉”潜力，为下一步制定性别敏感的动员策略提供科学参考。

一、中国女性“六型气候认知”潜力分析

（一）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问题和成因的认知度低，对担忧和重要性的认知度高

全国范围内，女性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度总体低于男性，城市女性认知度高于农村女性，农村男性的认知与城市女性较为接近，明显高于农村女性。整体呈现出随教育程度提高而认知水平上升的趋势，所有教育水平中女性低于男性；中年女性和男性的认知度最高，且在各年龄段中男性的认知水平均高于女性。

女性群体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随着收入的提升而上升。男性群体中中等收入的男性气候认知水平最高，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男女之间的认知差距最大，约8个百分点。

不同职业类别中的男性与女性在气候变化认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各职业群体中的认知水平普遍略低，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气候变化认知度最高，其中，近一半女性（44.9%）表示对气候变化“了解一些”或“了解很多”，而该职业群体中的男性认知水平最高，达到六成（60.7%）。商业从业者的认知度次之，女性近四成（39.3%），男性为44.3%，两者差距相对较小。学生群体中，女性和男性分别有37.1%与39.8%表示至少对气候变化有一些了解，是所有职业类别中性别差距最小的一组。在自由职业和退休群体中，男性和女性的认知差距尤为显著。

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是否在发生这一问题上的回答无显著性差异，都超过九成，女性总体略高于男性。中国公众在气候变化发生的认知大幅高于其他国家公众，是气候行动的有利基础。较高收入水平、大学学历以上、政府/国企/公务员群体的认可度接近100%。

在气候变化成因的认知上，女性对科学主流观点的理解仍显不足。仅有一半多女性（56.3%）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低于男性（63.4%）。虽然女性在气候变化是否发生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在气候变化成因认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城市女性（60.7%）和城市男性（66.3%）对气候变化人为成因的认知度均高于乡村的女性（49.1%）和男性（56.7%），差距在十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和乡村中男性认知度均高于女性。乡村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人为成因认

知最低。对气候变化人为成因的认知度随年龄增长而降低，而随学历而升高，随收入增长而升高。虽然在了解和成因上认知度低于男性，但整体来看，女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普遍高于男性。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主观认知略高于男性，更高比例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男性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有所上升，而女性则呈现出相反趋势。女性所有收入水平上更担心气候变化，较高收入女性最高，较低收入女性其次。城乡女性均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重要，略高于男性。特别是农村女性，虽然对气候变化的成因认知度较低，但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主观认知是所有组别中最高的。

（二）中国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总体高于男性，展现出更高的气候风险感知

女性更低比例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女性普遍更高比例认为气候变化会对自己与家人、本国公众、子孙后代和动植物带来伤害，女性对于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认知度普遍更高。结果反映出女性在主观层面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相对较弱。然而，考虑到数据来源于受访者的主观判断，该差异未必对应于女性在实际、客观层面上经历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低于男性。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观感知整体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变强，各教育水平、各年龄段、不同收入的男性主观感知均高于女性。62.9%大学学历以上女性称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略高于高中学历女性（61.2%），明显高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女性（53.7%）。中年女性称自身“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比例相对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女性。从不同职业群体看，除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外，女性更低比例说自己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影响，政府和退休、农人中男性女性差距最明显。

男性和女性受访者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造成的影响最大，其次依次为对子孙后代、中国人以及自身和家庭的影响。女性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各主体的伤害“中等”和“很大”的比例均略高于男性受访者，且经过卡方检测，女性认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显著高于男性。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女性在各教育水平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均高于男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年龄段升高而下降，女性在各年龄段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均高于男性。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随收入水平升高而升高，各收入水平差距较男性受访者更为显著。

女性在各职业上更高比例认同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至少有中等程度影响，总体高出男性五个百分点。女性在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如动植物）和代际后代的影响方面认知更高，在涉及个人与家庭层面时则更多表达中等程度的担忧。城市、大学学历以上、青年、较高收入、学生女性群体是对气候变化影响认知最高的群体，男性中有类似趋势。

（三）中国女性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展现出比男性更高的关注度和政策期待

中国女性在气候变化应对责任认知上展现出优势，普遍对各主体（尤其是政府和环保组织）的作用评价高于男性，且该优势在城市、高收入和老年群体中更明显。中国女性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展现出比男性更高的关注度和政策期待，普遍认同气候行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中女性支持率略高于男性。

无论经济条件如何，女性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和应对认知水平相对更高。经济条件较弱的群体中，性别差异有所减弱，但女性仍保持轻微优势。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在气候变化应对认知上整体表现优于男性，这一优势在不同年龄段和城乡群体中均有体现。尤其是在城市61岁以上群体中，女性得分（4.43）显著高于男性（4.24）。值得注意的是，农村31-45岁女性（3.83）是唯一得分低于同组男性（3.98）的组别。进一步分析年龄分层发现，性别差异在不同代际中呈现不同特征。中老年群体（46岁以上）的性别差异更为显著，特别是城市61岁以上女性表现出最强的环境认知（4.43）。这种代际差异可能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年轻一代的性别差距在缩小，但传统性别角色影响更深的年长群体仍保持显著差异。城市女性在各个年龄段几乎都保持领先优势，暗示城镇化可能强化了女性的环境意识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对气候变化（3.24）和教育（3.18）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男性，而男性对经济发展（3.22）、社会稳定（3.44）和就业（3.17）的评价高于女性，这种差异可能与社会性别角色期待相关。这一差异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城乡差异对性别认知的影响比性别本身更为显著。农村女性在多数维度（如就业3.18、社会稳定3.38）的评分普遍高于农村男性（就业3.13、社会稳定3.40），这与传统认知相反，可能反映农村女性更依赖政府支持；而城市男性在关键领域（如经济发展3.20、新冠疫情3.41）的评分则明显高于城市女性（经济发展3.21、新冠疫情3.34），显示城市男性对政府效能关注度更为敏感。

在生态保护方面，城乡男性评分（农村3.35、城市3.32）均高于女性（农村3.30、城市3.34），显示男性更认可政府对环境领域的作为。这种分化说明性别认知差异与具体政策领域密切相关，需针对性制定沟通策略。

这表明随着世代更替，性别差异呈现动态变化特征，需结合具体政策领域进行差异化分析。中国女性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展现出比男性更高的关注度和政策期待，特别是在环境健康和教育领域，同时城乡、收入和年龄等因素与性别交互作用形成了差异化的认知特征，气候政策制定需要采取更具性别敏感性的差异化策略。

受访者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经济发展存在性别差异。数据显示，74.9%的男性认为政策“促进经济”，显著高于女性的72.8%，而女性认为政策“阻碍经济”的比例（16.2%）也略高于男性（15.1%）。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男性更倾向于从宏观角度评估经济政策，而女性更关注政策对家庭经济、就业稳定等具体层面的潜在影响。为此，对男性群体可强化政策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宣传，而对女性群体则应更多展现政策对就业保障、民生改善等具体效益，以缩小认知差距。同时，两性中约10%的“无关”认知群体值得关注，可能需要通过更精准的政策解读提升其认知参与度。

无论男女，超90%受访者认为支持中国主动减排，体现强烈的环保责任感。女性更倾向“中国主导”，可能原因是女性环保意识更强，女性通常更关注健康和生活质量，易将污染与家庭福祉关联。女性更具风险规避倾向，女性更担忧气候变化的长期风险，支持主动干预。这种差异表明女性整体上更倾向于支持中国采取积极的环保行动，即使这意味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相比较下，男性更关注“国际公平”，对“美印先做”和“多数国家做”的支持略高，可能原因是男性更可能从国际博弈视角看待减排责任分配，对经济成本敏感，或担忧单边减排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

（四）中国女性对相关气候政策的认知度

1. 中国女性对双碳政策认知度低于男性，支持度高于男性，信心度方面相对谨慎保守

在双碳认知上，总体上女性低于男性，在各收入阶层的认知率均低于男性。在双碳政策支持上，呈现出明显的“女性优势”特征，且城市女性展现出压倒性的政策支持。在信心方面，男性群体表现出更强的乐观态度，而女性则相对谨慎保守。从性别与地区交叉视角，

东部地区男性信心更高。在化石能源使用态度上，男性女性都倾向于支持减少其使用，各收入层级的女性支持减碳的比例均高于同收入男性。相较中老年女性，青年女性对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支持率高。在可再生能源使用态度上，男性对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支持率更高，在各个年龄段的比例均高于女性，且高收入男性是所有群体中最高。

女性对碳中和目标的认知度显著低于男性。仍有半数女性（52.8%）未听说过碳中和目标，表明环保知识普及工作仍需加强，特别是针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差异化传播策略值得重视。

从性别视角来看，收入水平对双碳认知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数据显示，男性在各收入阶层的认知率均高于女性，其中高收入男性（80.6%）与高收入女性（59.7%）的差距高达20.9%，呈现出典型的“收入强化性别差异”现象。即便在高收入女性中，仍有40.3%未达到认知标准，表明单纯经济条件改善并不能完全消除性别差异，需要针对女性群体设计专门的环境教育项目。这种收入与性别的交叉影响，凸显出气候传播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从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双碳目标的支持度呈现出明显的女性优势，但这一优势在不同城乡群体中表现出差异化形态。在城市地区，女性展现出压倒性的政策支持，其“强烈支持”率（80.0%）不仅显著高于城市男性（77.4%），更创下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这种强势支持可能源于城市女性更高的环境意识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女性在“一般支持”维度同样保持高位（27.6%），形成“双高峰”支持结构，反映出该群体对双碳政策既抱有高度热情，又保持着理性评估的多元认知特点。

从性别视角来看，收入水平对双碳目标的支持态度呈现出复杂的性别差异模式。从收入视角分析，高收入男性的支持特征具有双重优势：不仅在绝对支持率上领先，其反对声音也最为微弱（“强烈反对”仅0.7%）。相比之下，女性群体虽然“强烈支持”率相对较低，但在“一般支持”维度普遍高于男性（如中收入女性23.4%，男性21.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女性成为反对率最高的群体（“一般反对”1.6%），反映出经济压力可能对女性政策认同产生更显著影响。这种差异格局表明，双碳政策的推进需要建立性别敏感的实施机制，尤其应关注高知女性群体的政策参与度和低收入女性的生计保障。

从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信心，男性群体表现出更强的乐观态度，而女性则相对谨慎保守。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信息获取渠道差异，男性更倾向于通过专业报告和工作场合获取双碳政策信息，而女性更多通过社交媒体和人际传播，导致认知深度不同；二是风险评估方式，女性对政策实施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如就业影响、能源价格波动等）更为敏感；三是表达习惯差，女性在态度表达上通常更为审慎，倾向于选择中间选项。这种性别差异格局提示，在双碳政策宣传和实施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性别群体采取差异化的沟通策略，特别是要加强面向女性群体的政策解读和信心建设。

从性别与地区交叉视角分析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信心度，数据揭示出四个关键发现：一是地区发展水平强化实现双碳目标的信心性别差距，东部男性信心最高（“一定能实现”60.3%），较东部女性（55.9%）高4.4个百分点；二是中西部性别差距更显著（男69.5%，女58.6%），差值达10.9个百分点，反映欠发达地区男性更易感知基建投资带来的转型红利；三是女性态度呈现“区域趋同”特征，东西部女性信心差异仅2.7个百分点（东部55.9%，中西部58.6%），但男性区域差异达9.2个百分点，显示女性对双碳目标的判断更少受地域经济条件影响；四是消极认知的性别分化，男性“不太可能”实现的比例（东部0.9%）是女性（0.4%）的2倍多。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男性更倾向极端化表达，而女性多选择“不好说”（东部35.1%/西部31.5%）的中间立场。

为此，相关工作中应采取差异化策略：一是在东部重点消除女性政策认知盲区，通过“她经济”场景普及碳中和场景和相应的技术。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强化公正转型宣传，突出性别平等的可再生能源就业机会。三是建立性别敏感的民意反馈机制，定期监测不同群体信心波动。

2. 农村女性对化石能源仍有较强依赖，各收入层级的女性支持减碳的比例均高于同收入男性

从性别和城乡交互数据看，男性女性都更倾向于支持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但仍有部分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认为未来应该增加化石能源规模。

从经济依赖性视角分析，数据显示农村女性支持“多一些”的比例（13.7%）显著高于城市女性（8.4%），印证了经济因素的关键影响。农村地区女性可能更直接

依赖传统能源相关产业（如煤炭产区）维持生计，其家庭收入与能源行业密切相关。当面临经济压力时，保障就业和收入的现实需求可能暂时超越环境关切。从能源可及性差异视角分析，在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农村地区，女性作为家庭能源主要管理者，可能因清洁能源获取困难而更务实。当沼气、太阳能等能源供应不稳定时，增加传统能源供给成为保障家庭炊事、取暖等基本需求的现实选择。这种“能源贫困”情境下的性别化体验，导致部分女性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从信息获取屏障视角分析，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可能导致部分女性群体（特别是低学历农村女性）接触不到完整的能源转型信息。研究显示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城市女性低1.8年，这可能限制其对能源政策环境效益的认知，从而延续传统能源依赖思维。

这些发现提醒政策制定者：在推进能源转型时，需要针对不同女性群体的具体需求设计差异化方案，包括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女性定向技能培训、完善女性友好的能源补贴机制等，才能实现真正包容性的能源转型。

数据显示，各收入层级的女性支持减碳的比例均高于同收入男性，这一现象呈现出稳定的跨阶层特征。这一发现为气候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即应重点发挥女性（尤其是高收入女性群体）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示范作用。为此在政策设计中可以重点考虑如下要素：针对女性群体强化减碳措施与健康、教育等关联议题的协同宣传；在社区减碳项目中优先培养女性意见领袖；建立性别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如对男性群体可突出减碳技术带来的经济机遇，而对女性群体则可强调环境改善对子女未来的积极影响；在女性从业集中的服务业优先部署分布式光伏，开发“家庭能源韧性”宣传框架，将减碳与能源安全诉求结合等，这种差异化策略有望形成更广泛的绿色转型社会共识。

数据还发现，能源转型或存在“性别化代际鸿沟”的问题。青年女性（18-30岁）对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少一些”的支持率（47.6%）最高，高于同年龄段男性群体（41.5%），也远超61岁以上女性（32.1%）。61岁以上中老年女性支持维持/增加化石能源的比例（14.2%）大约是18-30岁（7.2%）女性2倍，反映出代际认知差异对性别态度的影响。这一现象可以从结构性角度进行分析，如从教育赋能效应的视角分析，高等教育性别比例出现逆转，18-30岁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8.2%）已超过男性（55.8%），也就是说，系统性的环境教育使

女性更深入理解碳减排的科学逻辑；从健康驱动机制视角分析，青年女性对关注生育健康，一定程度列为减碳支持主因。

为此，相关工作中可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强化青年女性在家庭能源决策中的话语权，如设计“女儿动员妈妈”的传播策略；二是开发“她经济”碳中和场景，如美妆行业碳足迹可视化；三是在婚恋交友平台嵌入碳账户社交匹配功能，激活同龄人影响效应。

从性别与城乡交叉视角分析可持续能源使用态度，数据呈现出性别差异逆转现象。与传统能源态度相反，男性对增加可持续能源使用的支持度显著高于女性。这种逆转可能原因为：一是男性在新能源行业从业占比更高（约占63%），更了解技术发展；二是女性对技术快速推广可能带来的成本分摊更为谨慎；三是城乡差异的性别不对称性，农村女性成为最保守群体，支持维持现状（“和现在一样”）的比例达8.0%，是城市男性（3.2%）的2.5倍。城市男性表现出最强改革意愿，“少很多”选项仅0.8%，显示其认为现有转型速度仍不足；四是态度分布呈现“双峰”结构，城市群体集中在“多很多”（男74.2%/女65.8%）和“多一些”（男20.7%/女29.9%）。农村群体则呈现“多很多”（男70.2%/女53.9%）与“和现在一样”（男25.9%/女35.1%）两极分化。

为此，未来推广可再生能源时，可考虑重点突破农村女性群体：开发“女性光伏技术员”培训项目，通过经济赋能改变态度；建立性别差异化的推广策略，对男性强调技术创新，对女性突出民生改善；在城市设立“能源转型体验中心”，消除女性对技术变革的疑虑。

（五）中国女性总体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在说服他人和参与公共领域的气候行动潜力尤需挖掘

在购买气候友好产品的支付意愿上，女性总体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略高，但男性花最高额溢价的比例更高。从城乡差异看，城市女性是所有群体中支付意愿最强的。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整体随教育水平而上升。大学以上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高于大学以上男性，但其他教育水平上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低于同教育水平男性。相对来说，男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随教育水平变化没有女性那么明显，且没有固定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女性为气候友好产品支付溢价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而男性则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女

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水平随收入增高而升高，而男性受访者愿意支付的比例在中等收入男性受访者中最高。多花10%-20%的钱是所有收入水平上女性受访者愿意支付比例最高的两个溢价支付水平。

不同职业中，女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比例均高于同职业男性，农民和退休待业群体除外。男性在各职业中，愿意花21%及以上溢价的比例均高于同职业女性，但在学生和政府/国企/公务员中男性与女性愿意支付的比例类似。多花10%-20%的钱也是各职业女性受访者愿意支付比例最高的两个溢价支付水平。与溢价购买气候友好产品意愿类似，女性总体愿意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比例更高，但男性花最高额的比例更高。超四分之一女性（27.5%）愿意花60元抵消八分之一个人出行产生的碳排放量，是女性受访者中支付愿意比例最高的一个价格水平。不愿意支付的男性受访者（12.6%）比不愿意支付的女性受访者（7.6%）高出五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女性愿意支付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比例高于愿意支付溢价购买气候友好产品的比例。

从城乡差异看，女性在城市和农村中均表现出较男性更高的支付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意愿。与购买气候友好产品的支付意愿不同，花钱抵消个人碳排放没有固定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各教育水平上女性愿意花钱抵消的比例高于同等教育水平男性。在最高溢价水平上（多花480元/年）各教育水平女性均略低于男性，愿意花钱抵消的比例随学历水平增长。从收入水平上看，女性愿意花钱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水平随收入增高而升高。不同职业中，女性愿意花钱抵消个人碳排放的比例均高于同职业男性，但男性愿意花480元最高额比例均高于同职业女性，学生群体除外。

公众整体购买承诺碳中和的产品践行度较低，使用一次性用品等频率较高。在是否使用一次性用品的问题上，男性与女性的行为模式基本相似。女性总体一次性物品使用频率低于男性，表现略佳。但“从不”使用一次性用品的女性比例为6.2%，略低于男性的8.0%。在不购买非必要消费品的问题上，男性展现出更佳的实践频率，通过卡方检测有统计学上显著差异。超过三分之一（35.9%）男性表示“从不”购买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而仅四分之一女性“从不”购买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表示“经常”和“总是”购买非必需品的男性比例也低于女性。这反映出女性更频繁购买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需要加强消费中的环境意识或节制倾向。

减少购买长距离运输、反季节食品的频率是气候友

好的行动，因为运输和生产储存这些食品的碳排放量要高于运输里程短、当季的食物。在购买长距离运输、反季节食品的频率上，女性表现略佳，整体来看，女性在此项气候友好行为上略微表现出更高的日常实践频率。在低碳出行方面，虽然“经常”采用低碳出行方式的比例在两性中都不高，但女性的整体出行行为更偏向频率适中、日常整合性较高。

数据发现，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环保行为在整体社会中尚未形成稳定的高频率实践，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波动。捐赠、循环旧衣物在中国公众有一定实践度，但高频率实践者中的比例依然偏低，相较低碳出行、节约用电、避免食物浪费等气候友好行为仍需普及。节约用电在男女中均普及程度较高，是被最高频实践的行为之一。节能用电已成为较为广泛认同和践行的环保行为之一，男女之间的差异不大。食物从生产、运输到处理的全过程都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减少浪费不仅节省资源，还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在减少食物浪费的行为上，男女受访者实践频率均较高，无显著差异。

进一步从社会人口特征上对比，农村和城市男性购买承诺碳中和的产品频率均高于各自区域的女性，在城市中差距更大一些。从不同职业来看，男女学生和政府/国企/公务员是高频购买承诺碳中和产品比例最高的群体。综上所述，女性对低碳出行、捐赠循环利用旧衣物、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购买反季节长途运输食品实践程度更高；男性对购买碳中和商品、不购买非必需消费品、垃圾分类程度更高。节约用电、避免食物浪费等行为已较为普及，成为多数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这一分类有助于揭示哪些行为是性别实践分化的热点领域，也为未来在不同行为领域推动公众气候行动提供了策略方向。

在参加政府民间低碳活动、介绍低碳生活知识、媒体转发、捐款等方面，男性受访者的践行程度均略微高于女性。中国女性在说服他人和参与公共领域的气候行动潜力尤需挖掘。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参与气候传播的积极性普遍低于男性，尤其在高学历群体中差距更突出。

从不同职业看，农村女性的参与低碳活动的比例（48%）显著高于男性（44.7%），是唯一一个女性高于男性的职业类型。这说明农村女性在低碳活动参与和气候行动领导力上的潜力。总体来看，不同性别在专业领域的低碳参与行为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可结合职业特性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行动引导策略，提升各类人群特别是女性 in 专业领域的低碳实践积极性。

女性在低碳产品识别方面感受到更大的困难，反映出当前低碳产品缺乏明确标签和传播渠道的问题。28.3%的女性选择了“我周围很少有人采纳低碳生活方式”视为阻碍因素，高于男性的22.6%。这提示女性更关注社会氛围和他人行为，若缺乏身边人的榜样力量，可能影响其参与低碳行为的积极性。

女性在多个维度上对低碳生活的障碍感知更为明显，特别是在获取信息、社会氛围感知以及经济负担等方面。这些差异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在推动低碳转型过程中，应更加关注女性面临的认知和结构性限制。

（六）信息接收偏好存在明显性别差异

从听说气候变化的频率、渠道、受访者关注的新闻内容、对气候变化信息进一步了解的意愿、和信任的信息源五个维度分析中国女性接受气候变化信息的现状。整体来看，女性容易从日常渠道中接触到气候话题，在日常生活中高频听说气候变化的比例低于男性，但都有较强意愿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如气候变化的成因、政策、与日常生活的联系等。女性受访者相较男性更多从家人朋友、社交媒体、视频平台接受信息，且对于官方权威性信息源（政府、科研机构）、社会组织、还有个人生活网络中的信息源（家人、社交媒体、朋友）有较佳的信任度。不同性别受访者对关注的新闻内容、信任的信息源、和愿意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的议题维度回答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为针对不同群体的气候变化传播策略提供了参考。

数据分析表明，女性更倾向于通过人际传播、电视及数字媒体获取气候变化信息，且高频接触的比例普遍高于男性。男性则在报纸、电脑网页等渠道表现更为活跃，但高频接触者比例多低于女性。男女在传统媒体和部分数字渠道的差异较为明显，而在社交媒体、视频平台等新兴渠道的差异相对较小。

女性更关注社会、娱乐、环境类新闻。在“最关注社会新闻”方面，57.8%的女性表示关注，明显高于男性的43.8%。在“最关注娱乐新闻”方面，女性关注度达到39.6%，而男性仅为15.8%，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在环境新闻的关注上，女性略高。这显示出女性更倾向于关注人文、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内容。男性更高比例关注政治、科技、体育和经济类新闻。在“最关注政治新闻”中，52.8%的男性表示关注，高于女性的41.5%。科技新闻方面，男性的关注度为36.6%，也显著高于女性

的23.3%。在体育新闻方面，性别差异尤为突出，24.2%的男性表示体育是他们最关注的新闻类型，而女性仅为17.3%。在经济新闻中，不同性别的关注度差距较小，男性关注度为39.2%，略高于女性的35.2%。

信息接收偏好的性别差异提示我们，在气候传播策略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不同性别群体获取信息的媒介路径和内容偏好。例如，针对女性受众，可以强化气候变化与日常社会关系、社区影响、弱势群体等社会维度的联系，提升情感共鸣与公共参与感；而针对男性受众，则可以强调气候政策、治理措施、国家承诺等政治维度，从宏观角度强化其责任意识 and 理性关注。在经济和环境类新闻两个领域可以作为通用的信息渠道向广泛公众进行主流传播。例如，可通过能源转型、绿色产业、碳市场、气候风险等经济视角，或通过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极端天气事件等环境视角，传达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现实关联。

二、中国女性气候认知与行动“**五维交叉**”潜力分析

通过性别与城乡、年龄、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进行五维交叉，除了发现对上述结论的一些印证，还可得到更多不同的启发。

（一）城乡维度：农村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主观重要性认知和担忧感最强

在认知方面，城市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均高于乡村居民，其中城市男性认知度最高，乡村女性最低，城乡差距在女性中更明显；城市女性在“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发生”的主观判断上略高于男性。

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上，城市和乡村男性更常表示自己经历过气候影响，乡村女性则最少；但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更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等风险。

在政策态度上，女性群体普遍更支持气候行动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城市女性支持度最高；而男性对技术性政策（如减少化石能源、碳中和）认知更高，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在女性中尤为显著。

行为层面，男性更倾向节约用电、避免浪费等理性行为，女性则更常低碳出行、捐赠旧衣等生活行为，乡村男女差异小于城市；男性更积极参与公众低碳传播行为，乡村男性参与度最高。

信息接触方面，男性更常“听说过”气候变化，乡村男性信息接触频率最高；女性则表现出更高的信息信任度，城市女性尤为显著，乡村女性则更信任来自家人和社区的信息源。在了解意愿上，女性普遍更愿意进一步获取气候信息，城市女性最高，城乡男性差异较小。

总体而言，城市男性是认知和政策技术性的理性高认群体，城市女性则是支持度与学习意愿兼具的高关注群体；乡村女性虽在认知和信息获取上处于弱势，但对气候变化的主观重要性认知与担忧感最强，值得政策推广时重点覆盖。

（二）年龄维度：中年女性表现出较高参与潜力

从整体来看，老年女性普遍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参与程度最低，而中年女性则表现出最高的参与水平。无论是在气候变化的基本知识、对其成因与影响的理解，还是对气候行动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认可度方面，中年女性均普遍高于老年女性。在亲身经历气候变化方面，中年女性的感知最为强烈，而男性则随年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无论性别，气候风险感知普遍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表明年轻群体更可能认为气候变化带来风险。

在女性群体中，对双碳目标的认知度、支持度及信心度总体较高，但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这一趋势同样体现在对可再生能源使用与减少化石能源依赖的支持上，尽管女性的支持度略低于男性。在气候行动的付费意愿方面，女性的年龄效应表现为随年龄增长而递减，而男性则呈现相反趋势，年龄越大，付费意愿越强。

在低碳生活方式方面，老年女性更倾向于同意相关障碍的存在，例如“复杂”或“不便”等负面评价；而中年女性则在总体上展现出更强的意愿接受低碳生活。相对而言，男性对于低碳生活障碍的认同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此外，在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频率上，中年女性表现最为积极，而男性则随年龄增长而更频繁地接触相关信息。在环境新闻兴趣方面，中年女性的关注度最高，老年男性的关注度则最低。这一系列差异反映出中年女性在气候知识、风险感知、政策支持和生活实践层面均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潜力，是当前和未来气候传播与行动动员中应重点关注的群体。

（三）收入维度：中高收入女性是气候关注和支持最积极的群体

在认知方面，所有收入水平上男性普遍高于女性，中等收入群体认知最高，乡村与城市、男女之间呈现一致模式；较高收入群体无论男女，对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及人为原因的认知度也最高。在气候变化影响认知上，女性更担心气候变化对健康与生态带来的伤害，尤其是较高收入女性；男性则在经历气候影响的自述比例上更高，较低收入男性感受最强。

在政策态度上，女性整体更支持气候行动的社会效益，尤其在中高收入群体中更为突出；男性则在听说过碳中和目标、支持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上更高。整体上，不论收入水平，女性在认同减少污染、支持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比例普遍较高，且碳中和支持度接近一致的高水平。

在行为实践上，高收入群体在节能减排类日常行为上稍好，低收入群体尤其女性在低碳出行上行动率最高，但同时低收入群体也更多使用一次性用品；男性各收入水平更积极参与公众气候行动，低收入男性参与度最高。

在信息来源和传播上，男性在各收入水平上听说气候变化比例更高，中等收入群体整体接触度最高；低收入群体更多通过传统媒体和家人朋友了解气候变化，高收入群体则更依赖社交媒体与新闻网页。在了解意愿和信任度方面，女性在各收入水平上普遍更愿意了解气候变化信息，尤其是高收入女性；但随收入提升，整体对各类信息源的信任度有所下降。政府、科研机构和家人是最被信任的信息源，不同收入和性别群体对新闻类别关注也呈现性别差异，女性偏向社会与娱乐新闻，男性偏好科技、体育与政治新闻。

总体来看，中高收入女性是气候关注和支持最积极的群体，而低收入女性在感知气候影响和实际气候行动中展现出重要潜力，针对不同收入和性别群体的差异化沟通和政策设计尤为关键。

（四）职业维度：政府工作人员、学生可做表率，农人、退休群体认知低

在认知方面，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气候变化认知度整体最高，均有超过97%的比例认同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自由职业者、农人和退休待业人员中的女性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尤其在“至少有一些了解”方面，与相同职业男性差距显著。在人为成因的认知上，女性学生是认知比例最高的群体，超过三分之二明确指出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其

次是政府/公务员群体。在气候变化影响认知中，女性学生、政府/公务员与自由职业者的担忧程度最高，认同比例均超95%；而退休待业与农村女性认知相对较低。自述经历过气候变化影响的比例方面，自由职业女性排在首位，其次是商业/技术人员与政府/公务员女性，而农人和退休女性主观感受最弱。

在政策态度方面，各职业群体中女性普遍比男性更认同气候行动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尤其在政府/国企与学生群体中尤为突出。各职业女性中，普遍更高比例支持中国在气候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国际责任立场（即不论他国是否行动都应减少污染），农人群体除外。

在行为实践方面，学生、自由职业者与政府/国企/公务员女性整体气候友好的行动意愿突出，表现也较好。例如，在碳抵消支付意愿上较为突出，这些群体愿意每年花较高额抵消个人出行碳排放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在实际购买碳中和产品的比例上，学生和政府/国企女性也是最积极的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农人和退休女性虽然整体认知水平较低，但在碳抵消支付意愿上对比同群体男性展现出更积极态度。在参与公众气候行动方面，如向他人介绍气候知识、社交媒体转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等，自由职业群体的女性实践度较好。

在信息获取与传播方面，女性在多数职业群体中对政府与科研机构作为信息来源的信任度高于男性，尤其在退休与政府/公务员群体中尤为明显。学生群体男女均对信息源信任度高，且在新闻关注类型上性别差异最显著。信息获取频率方面，政府、农人、自由职业者中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听说气候变化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而从家人和朋友渠道获取气候信息的比例上，女性普遍高于男性，尤其在退休和农村女性中表现明显。

综上所述，学生、政府/公务员与自由职业女性是气候认知、政策支持与行动参与都较为积极的群体，而农人和退休待业女性虽然认知水平较低，但在实际行动意愿上展现出潜力，值得通过针对性的信息传播与政策激励进一步支持和引导。基于女性，尤其是退休和农村女性，更倾向通过家人和朋友获取气候信息的特点，可通过激活其熟人社会网络、推动邻里式气候传播，提升气候议题在社区中的认知覆盖和行动参与。

（五）教育水平维度：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更高的环境责任感

在认知方面，女性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整体随教育程度提升而增强。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中，约四成表

示对气候变化了解一些或很多。在气候变化人为成因的认知方面，认同气候变化的认为成因比例与教育水平成正比，说明教育水平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女性对气候变化机制的理解。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知在高中学历女性中最高，其次为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而初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的认知最低。主观经历气候变化影响的比例也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大学学历以上女性中表示经历过气候变化影响的人数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十个百分点。

在政策态度方面，女性的支持度整体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无论是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同，还是对其影响的担忧，高学历女性群体均展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这表明，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女性更深刻地理解气候变化的系统性后果，并更倾向于支持相关政策。

在行为实践方面，女性的实践度和行为意愿并非随教育水平升高而提升，甚至在一些行为上初中及高中教育水平女性略佳。例如，花钱抵消个人碳排放”的维度上，教育水平与支付意愿之间未呈现线性趋势，大学以上学历女性不愿意的比例略高。但整体来看，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更高的环境责任感。如在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溢价的比例随教育程度上升而增加：大学以上学历女性中不愿意支付的比例低于初中以下学历女性十五个百分点。此外，提升教育水平可能有助于降低女性实践气候友好生活方式的困难，如更好地识别低碳产品，削弱信息障碍带来的消费阻力。

在信息获取与传播方面，初高中学历女性更高比例在生活中经常听说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或反映气候变化议题在基础教育系统中普及较好。不同教育水平女性的信息获取渠道存在明显差异：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更多通过户外广告牌、杂志以及家人朋友等传统和熟人路径接触到气候变化信息，说明其信息获取更依赖线下场景与社会网络；高中学历女性在视频平台和新闻类手机应用上获取气候信息的比例较高；大学及以上学历女性则更常通过社交媒体、电脑网页等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同时，大学及以上学历女性在提升知识的主动性上表现更强，更高比例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的各类议题，如成因、影响、应对措施与政策。

总体来看，教育水平的提升在增强女性气候认知与政策支持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但在行动转化层面效果相对有限。这提醒我们，在推动女性气候行为转化时，不能仅依赖于提升认知或教育水平，更需从行为机制、社会角色和日常情境出发，设计更具包容性和可操作性的

政策与传播策略。对于学历较低的群体，应充分利用熟人传播、社区平台与线下可视化媒介等方式，强化口语化、场景化表达；而对于中高学历群体，适合通过内容深度更高、交互性更强的数字平台进行定向推送与参与式传播。

三、行动建议

在气候变化总认知度提升方面，建议针对性别差异强化政策的性别响应。一方面，强化女性在气候传播中的关键作用。由于女性整体认知度高于男性，但高龄女性（61+岁）优势减弱。采取社区动员方式，发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培训“女性气候宣传员”，通过社区活动（如低碳生活工作坊）传播气候知识。对高龄女性采取专项教育，针对61岁以上女性，开发通俗易懂的传播材料（如短视频、广播节目），避免认知度下降。另一方面，弥补男性认知短板。由于男性认知度普遍较低，可能因传统性别角色对环保议题关注不足。通过企业ESG培训、工会活动等渠道，向男性劳动者传递“双碳”政策，利用体育赛事（如足球联赛）、科技展会等男性参与度高的场景，植入低碳宣传内容。可考虑分年龄段的精准干预。青年群体（18-30岁），需加强基础教育。将气候变化科学纳入义务教育必修内容，高校增设“碳中和通识课”、或与平台类型企业合作推出“双碳挑战赛”，激励青年创作科普内容。针对中老年群体（31-60岁），通过社区实践平台和职业培训联动的方式帮助提高认知，进而转化为行动力。对高龄群体（61+岁），开设“气候变化与健康”老年课程，结合养生知识传递低碳理念；设计“孙辈敬老辈”互动活动（如家庭碳足迹计算），利用亲情纽带强化认知。

在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度提升方面，建议采取性别敏感的政策干预，如针对中老年女性群体特别是61岁以上女性（支持度最低群体），开发“银发双碳”宣传项目，通过老年大学开设气候健康课程，组建退休专家宣讲团，并设计家庭节能激励计划。加强青年女性参与机制，鼓励高校女性工作者成立双碳相关的创新实验室定向研发性别敏感的传播内容，开展青年女性志愿者进社区面向61岁以上女性进行定向宣传，促进代际沟通。建立动态监测系统，按季度追踪不同性别群体的态度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策略。针对中老年女性群体特别是61岁以上女性群体支持度偏低，建议实施“透明双

碳”信任建设工程，定期发布各行业减排进展数据，设立性别友好的政策体验中心展示最新成果；针对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开发可视化宣传工具，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开放政策制定参与渠道。通过“绿碳积分”等行为激励措施，将政策支持转化为实际行动，重点化解中老年女性群体对经济转型的顾虑，缩小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群体的认知差距，构建全社会支持双碳目标的良好生态。

在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度提升方面，建议针对目标群体精准沟通。针对31-45岁女性群体，配套产业转型保障政策（如再就业培训），并通过案例展示区域试点成效，进一步强化其信心和支持。对中等教育女性群体，开发可视化政策工具，避免技术术语造成的理解障碍。发挥青年女性群体传播优势，利用青年女性高信心特征，培育双碳女性代言人进行同辈传播，将气候教育前置到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巩固信心基础。对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强调家庭健康收益（如减碳对儿童呼吸健康改善）。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突出女性在绿色转型，特别是科技领域的职业发展机会。

在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度提升方面，建议建议采取“认知+激励”双轮驱动策略以提升女性对气候友好型产品的支付意愿。首先重点加强气候变化科普教育，针对46-60岁高行动力女性群体开展“绿色消费带头人”培养计划，发挥其社会影响力。同时为高等教育女性群体设计专属绿色消费补贴和产品体验活动，破解其“高认知低行动”困境。建立“认知-行为”联动机制：对中老年女性高认知群体，提供便捷的低碳行动工具（如碳积分APP）；对青年男性这类低认知群体，优先通过利益关联（如减碳补贴）激发兴趣。建议细化开发性别敏感的“碳普惠”平台，针对识别出的女性认知特征将绿色消费行为转化为女性友好的积分奖励，并针对中等收入家庭提供阶梯式价格补贴，降低支付门槛。建议根据数据建立性别敏感的动态监测机制，按性别、年龄、地区细分“双碳认知指数”，每年评估政策效果，及时调整策略。

